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入门

研究生·学术入门手册

戴燕◎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入门/戴燕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5
(研究生·学术入门手册)
ISBN 978-7-309-06641-8

Ⅰ.魏… Ⅱ.戴… Ⅲ.文学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研究生-教学参考资料 Ⅳ.I20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7495 号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入门
戴 燕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崇明南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18 千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9-06641-8/I·488
定 价 18.00 元

编辑缘起

“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这是我对大学人文学科基本教育和专业训练三个阶段的理解。如今大学越来越多，条件不一，水平参差，指导者的路数不同，不同学校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和标准也不同，有些指导教师似乎对这三种教育没有区分，有时候把研究生当作大学生，塞上一堆“常识”便草草了事，使得早已掌握了基本知识的研究生要么对课程失去兴趣，要么以为“学术”不过如此，“研究”就是重复叙述；有时候又把大学生当作研究生，基本常识还不具备时，便传授种种“偏方”“秘方”，使大学生早早学会了出偏锋、用怪招。因此，我们策划编辑这一套“入门手册”，让作者特别针对刚刚完成大学学业进入硕士生时期的人编写，意在引导他们知道初步的“研究方法”，以

区别大学阶段的“常识学习”。

这套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编撰者，都是“学有所成”而且是“术有专攻”的学者，专业各有偏重，领域宽窄不一，但是，我想在他们撰写的这本入门书中，都必然包括“历史”、“方法”和“视野”这三方面。所谓“历史”，就是了解本领域的历史即学术史，知道在自己之前，前辈和同行已经做了些什么，是怎么做的，因此可以“踏在前人搭好的桥板上”，不必重起炉灶“而今迈步从头越”，也不能掩耳盗铃装作自己是“垦荒”或“开拓”。所谓“方法”，就是选择本领域目前最通行和最有效的方法，一一加以解说，并选择若干最好的典范论著，让阅读者“见贤思齐”，哪怕是“照猫画虎”，因为最初的研究不妨有一些模仿，当然模仿的应当是最高明的杰作，这才是“取法乎上”。所谓“视野”，就是开列出中国和国外在本领域最基本的和最深入的论著，使得研究生不至于“拣到篮子便是菜”，反而漏掉了必读的经典，形成引用参考文献的“随意”。这一部分可能包括了超出硕士生，甚至可以提供给博士生使用的、中外文的“进阶书目”，通过参考文献提供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让阅读者通过简单的论著名录，知道世界上的同行在做些什么。我想，大学教授最重要的责任，不是拔苗助长地呵护几个早早脱颖而出的杰出学生，而是齐头并进地保证进入研究领域的普通学生，这套入门手册

不是针对天才而是保证底线的，为了让硕士生尽快超越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习惯，了解最一般的研究途径，开始具有个性的思考，建立学术研究的角度和立场，形成遵守规范的研究习惯，我觉得“历史”、“方法”和“视野”是每一个合格的研究生都必须具备的。

这套研究入门手册的编撰和出版，要感谢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也要感谢参与编写的各位杰出学者热情参与，他们都是很忙碌的人，但是他们能够放下手头的工作，慷慨承诺撰写这套入门书，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参加者和支持者，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学术方法的传递和学术薪火的延续，比什么都重要。



目　录

1

引　言

在我们目前的文学史学科里面，按照时代划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自成一段。

这种利用政治上的王朝更迭，来作为文学史单元的切割标准的所谓断代方法，在倡导文学独立，相信文学具有普遍性质，应当能够超越任何国族与政治界限的现代人的眼里，究竟是不是合理，先不去管它。

在历来的实际研究当中，由于公认能够代表曹魏时代文学成就的一些重要作家，大多仅只活到汉献帝的建安之年，讲这一段的文学史，因而通常总要习惯性地上溯到东汉末期，也就是曹丕尚未登基建立魏国之前，这一点，先也不去说它。

还有，苏轼表彰韩愈，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话，把韩愈生活的唐代中期，看成一个文学的分水岭，按照苏轼的意思，就是说，至少也要延长到初唐时期，才能够比较清楚地看见这

一阶段文学史的完整脉络，就是这一条，也要先把它放下。

暂时放下这些疑问，并不是说，牵涉到文学史断代，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学史性质的判断、源流的探查、成就的评价，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已经统统被解决掉了，而是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在我们熟悉的学科环境里面，既是权宜的，也是约定俗成的一个专业科目、一个研究领域。总之，是一种通行的称呼，替代它的，大概只有“中古”、“中世”甚或“六朝”这几个名目。

这是在进入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之前，需要了解的第一点。还有需要了解的以下第二点。

现代人研究古代文学，讲究的是科学。所谓科学，在很多人看来，首先，就是要能够将自己与古代文学区分开来，好像法官办案，时时刻刻跟犯罪嫌疑人保持足够的距离，避免主观介入，防止感情用事，以此来确保判决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所以，现代一些做文学史的人，特别好讲真伪、讲实事求是，作家的生卒年，要考清楚，作品是不是经过了伪造和篡改，要弄明白，这是进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步。经由可靠的文献与考古资料，还原古代文学的历史真相，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是现代人的追求。

可是另一方面，通过可靠文献及考古资料还原文学史的真相，也并不就是要将古代文学的面貌，依样画葫芦般地原封不动呈现出来。因为古代跟我们相隔，还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距离，有时候我们说，八世纪的唐诗、十二世纪的宋词并不一定就比十五世纪的明诗、十八世纪的清词离现代的读

者更远。当我们面对古代，遥想当初，事实上很难做到无动于衷、铁面无私，毕竟那些逝去的岁月，以及与之相伴的多姿多彩的文学，跟我们有着血缘的关系，我们是它的后裔、它的亲族，因为有它们，才有了今天的我们。我们与古代之间，就存在有这样的基因遗传性，这决定了我们和古代的距离，始终也只能是一种在心理上和主观上努力保持的距离，而现代人的研究古代文学，也往往会像子孙后代追忆自己的祖先那样，无可避免地要在叙述当中，渗透感情，表达认同。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现代学术史上之被关注、被研究、被描述，多多少少就是同现代人从这一时期的文学中间，体会到某种关联，寻找到某种寄托，密不可分的。



2

“选学”的复兴与传统的终结

近代以来，首开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著述风气的，公推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部以魏、晋、宋、齐、梁、陈六朝文学为叙述主线的文学史讲义，是刘师培生前最后一年——1918 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写的。

刘师培早年热衷于对满清封建政府的革命，后来改变政治立场，变得保守起来，学术上却日益精进。当他 1917 年到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虽然已经有陈独秀、胡适这一批人，在《新青年》上号召“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锋芒毕现，然而代表着古文传统的“桐城派”的文学势力，也并没有完全退出当时的文坛及大学。刘师培是隶属扬州府的仪征人，时常惦念着“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尹炎武《刘师培外传》)，以为自己的使命，因而他在课堂上讲授中古文学、首先针对的就是这桐城文派。

刘师培是希望重新发掘由梁昭明太子萧统提出的“事出

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这样一个文学思想,同时借由弘扬中古文学的这一传统,来作一个历史的大回转,好跟以“从质舍文”为标榜的桐城派相抗衡。所以,在这部讲义的第二课,他就承接过扬州的前辈学者阮元所提出“文笔之辨”的话题,专门讨论起中古时代“文”“笔”概念的问题。

他像阮元一样,一面详加梳理和辨析中古时期有关“文”“笔”的众多资料,指出在当时的语境之中,只有“偶语韵词”,方才可以称“文”,但凡“非偶语韵词”,都只能叫做“笔”;而另一面,他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崇尚“偶语韵词”的这种中古文学观念的偏好,同时坚持认为“言无藻韵,弗得名文”,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看法。他还批评桐城派一味尊奉韩愈古文的做法,是误把“笔”,当成了“文”,而以韩愈的古文为文章正宗,恰恰就是“文”“笔”混淆、文学堕落的一个现象。他有一段相当严厉的批评说:

> 合前列各证观之,知散行之体,概与文殊。唐、宋以降,此谊弗明,散体之作,亦入文集。若从孔子“正名”之谊,则言无藻韵,弗得名文;以笔冒文,误孰甚焉。又文苑列传,前史佥同。唐、宋以降,文学陵迟,仅工散体,恒立专传。名实弗昭,万民丧察,因并辨之。(第二课《文学辨体》)

如果我们说,刘师培的这一立场,表现出他仍然还是把自己限定在传统文章学的范围,他对桐城派的意见,也仍然是中唐以后、宋明以来的所谓“骈散之争”的延续,那么,他在

讲义的第一课《概论》里面，开门见山所谈的：

> 物成而丽，交错发形；分动而明，刚柔判象：在物佥然，文亦犹之。惟是捈欲通懥，紘埏实同；偶类齐音，中邦臻极。何则？准声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单音，所施斯适。远国异人，书违颉、诵，翰藻弗殊，侔均斯逊。是则音泮轾轩，象昭明两，比物丑类，泯踦从齐，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
>
> 此一则明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

这样一种对有别于“远国异人”的汉语言文字，它的“字必单音”即一字一音的声形特征的认识，特别是对充分利用汉字特点书写的俪文律诗的期待，即所谓“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实际上便反映出，他在 20 世纪之初讲授中古文学，与历来文章家的骈散之争，事实上又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牵扯到他对民族国家之存亡，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其实有着相当深刻的关怀和思考。

在刘师培这一派“国粹”学家看来，中国当时面临的，不仅仅有“亡国”、“亡种”，也有“亡学”，亦即传统文化迅速坠落以至于彻底消失的危机，在西方文化大潮扑面而来的冲击之下，保存与复兴传统文化的“存学”，于是变成了跟“保种”、“爱国”同等重要的大事情。国学亡，种族与国家随之以亡；国学存，种族与国家赖之以存。

那么，什么是国学呢？自然是唯中国独有的传统学术文

化，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承载媒介的汉字，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许多人都意识到，汉字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和西方的文字不同，一直保留着图像的特点，是象形的，而没有变成欧洲的那种拼音字母的形式。用汉字写出的文学作品，因此可以同时诉诸眼睛和耳朵，能够带来视觉的与听觉的双重美感。在刘师培看来，这样的单音节的汉字以及基于汉字特点写成的韵文律诗，理所当然地，是“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的一种中国文化传统。而以汉字书写的“俪文律诗”，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既超越了具体时代、也超越了个别流派的，具有代表性和普遍价值的中国文学，能够当得上真正“国学”的名义，代表中国，去与“外域文学”较一短长。

从这样一个思路和推论中，就能够看到，刘师培之所以刻意标举中古文学，原来还有着超乎与桐城文派相抗衡之上的更深邃的意涵，也可以说，这是他在西潮澎湃的大背景下，刻意选择的一个立场、一种姿态。主张汉字的保存、表彰利用汉字的声韵和形态特点书写出来的中古文学，是由于他相信，只有这样独一无二的文学，才具备与“外域文学竞长”的资格，才有实力让中国文学永远地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而这一点，也正符合“文学史”这一近代学科本身所树立的宗旨和目标，就是利用文学史的书写，来寻求民族国家的认同，来凝聚民族精神。

比刘师培更早几年，在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林传甲，其实就已经表达过要把汉字当国粹，要格外珍惜用汉字写出的中国文学的意见：

> 窃谓泰西文法，亦不能不用对偶，中国骈文，亦必终古不能废也。(《中国文学史》第十六篇《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

就林传甲本人而言，他对骈文，本来并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不过他也知道，骈文因其独特，恰可以为中国文学的代表。

同样的，1914 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桐城派学者姚永朴，也曾经发表有希望通过文学教育，来培养爱国精神的如下宣言：

> 夫国之所藉以立，岂有过于文学者……盖文字之于国，上可以溯诸古昔而知建立所由来，中可以合大群而激发其爱国之念，下可以贻万世而宣其德化政治于无穷……夫武卫者，保国之形式也；文教者，保国之精神也。(姚永朴《文学研究法》)

这就表明，无论"选学"家，抑或"桐城"派，都是把对传统文学的弘扬与传授，视为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一种利器的。

这一派"国粹"家的理念，同正在激流勇进的"新文学"运动，显然格格不入；同"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某些激进的观点，像废除汉字、使用拼音字母等等的主张，尤其背道而驰。依照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的看法，诗文讲究骈偶，已经是古人走过的一条错误的道路，一千年后的现代人，如果将错就错，复又推波助澜，那跟"缠小脚本是一件最丑恶又是最不人道的事，然而居然有人模仿，有人提倡"(《白话文学史》上卷第一编)这样不可理喻之古怪现象，不就是没有多少差别？

但是，当 20 世纪民国初年，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传统的中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学与文化强有力的挑战的时候，像刘师培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却还依然沉浸在传统文学与文化的感动之中，不愿轻言放弃，不愿改弦更张。他们重新祭起“骈文俪辞”的大旗，试图以中古文学为号召，来改造他们以为只是被桐城末流带坏的业已僵化的文坛，在这个实际上已经是门户大开、被外来文学及文化搅扰得没有片刻安宁的当代文坛，他们想要用的，仍然是“以旧易旧”的办法，结果，自然收效甚微。

不过，刘师培及其同道与他们的弟子，在现代大学的课堂上讲授并褒扬中古文学，却是将一种古典的研究风气，带到了校园之中。而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在学术界的影响，更是穿越了将近一个世纪。



3

平民文学的倡导与乐府研究的兴盛

但是另一方面，自从 1916、1917 年胡适、陈独秀相继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把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的律诗骈文，视若“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冠以“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的名号，批评它们与八股试帖一样，代表的是“文学之末运”，而得到钱玄同、周作人等一班“新文学”健将“文当废骈，诗当废律”的呼应之后；当这些“新文学”家们一心一意地一面在普及和推广“白话文学”，一面要打到“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特别反对“搬运他那垃圾的典故，肉麻的词藻”与“可笑的义法，无谓的格律”（钱玄同《尝试集·序》）之后，恰恰是以讲究用典和对仗为特征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格外强调不用典、不避俗字俗语、不作无病呻吟的这样一个“新文学”的评价系统里面，它的地位，毫无疑问要一落千丈。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以“白话文学”为号召的“新文学”

风潮，毅然截断了自己与文选派或桐城派等等的旧的文学传统的联系，抛开历史旧账，对于僵持了上千年的文学的骈散之争，再也不予理会；“新文学”家们更是按照新的文学理念，重新给文学作了“贵族”和“平民”这样的阶级式的划分，同时宣称坚守平民文学的立场。在这以后，为了确立平民的白话文学的正统地位，并且追根溯源，重写历史，为它找到一个“光荣的祖先”，“新文学”家们从此也开启了另外一条思路，便是在文学史上，也包括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上，着力发现平民文学，对平民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胡适 1921 年所写《国语文学史》的讲稿里，它的第一编，题目就是《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

为什么从汉代讲起？按照胡适的解释，由于汉代正是与白话文相对立的古体文产生的年代。他说，自从汉武帝采取“文言”来作全国交通的媒介，古体文的势力，就此在中国足足保存了两千年，但这种古文，却是小老百姓连小官也看不懂的死文字，由此：

> 二千年的文学史上，所以能有一点生气，所以能有一点人味，全靠有那无数小百姓和那无数小百姓的代表平民文学在那里打一点底子。（《国语文学史》第一编第二章《汉朝的平民文学》）

这就决定了，要想原原本本地了解平民的两千年的白话文学史，势必要回到汉代，也就是汉语言分裂、古体文与和它对立的白话文同时产生的时代，从那儿开始，讲述延续至今的白

话的国语文学史。

在这部讲稿里，汉魏六朝文学中，被胡适点名为白话文学的，除了汉代王褒的一篇《僮约》、任昉《奏弹刘整》里的一段语体文（中间引刘寅妻范氏的诉状以及奴海蛤等的供状）、陶渊明的若干诗作，其余绝大多数都为乐府诗。如汉乐府中的《孤儿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魏晋南北朝乐府中，南方的，如《子夜歌》、《前溪歌》、《团扇歌》、《华山畿》等，北方的，如《敕勒歌》、《陇头歌》、《木兰诗》等，这些都被看成是白话的平民文学的杰作。那里头唯一例外的，是汉代的《郊祀歌》，它是地地道道的古文文学和庙堂文学。

汉魏晋南北朝的"平民文学"，有许多原来保存在乐府里面。胡适的这样一个论断，与他在这里所举作品之例，以及对作品的分析，为此后数十年的乐府诗研究，可以说是带来了一股相当大的驱动力。

云南的徐嘉瑞在 1923 年编写的《中古文学概论（上）》，大概就算是遵照这一"新文学"观念，编写出来的最早的一部中古文学史的教材，胡适给它很高的评价，称之为"开先路的书"。在为它写下的长篇序言中，胡适说：

> （徐嘉瑞）认定中古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部分是在那时间的平民文学，所以他把平民文学的叙述放在主要的地位，而这一千年的贵族文学只占了一个很不冠冕的位子……无论如何，他这部书总是一部开先路的书，可以使赞成的人得许多参考的材料，也可以使反对的人得一些刺激反省的材料。（胡适《中古文学概论序》）

徐嘉瑞所说“中古”，指的是由汉到唐这一阶段；而他所说“文学”，恰好又分别为“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

历史上的文学，怎么区分它是“平民的”，还是“贵族的”？徐嘉瑞在这里告诉我们，首先，要看它作品的内容，究竟是取材于宫廷、表现对君权崇拜的，还是取材于民间、摹写现实人生的，此其一；第二，要看它的写作形式，究竟为古典的、堆砌的，抑或为写实的、生动的；第三，要看作者的身份和位置，究竟属于知识阶级、官僚，还是属于非知识阶级、无名氏。上述三条，当然非徐嘉瑞独创，不过是从“新文学”家们对于文学的一般定义中，移植过来的；只是除此而外，还有一条，是他新增加的，那就是还要看作品和音乐的关系如何，不能够协音律、与音乐无关的，仍然是贵族文学，能够协律的，才是平民文学。

他引《礼记》里的“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悦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段话，以证明中国的古代文学，应该都可以被之管弦。他说：

> 从《三百篇》起，一直到了词曲，都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音乐系统，即是文学系统。此种“音乐的文学史”，从来编文学史的，都没有注意。他们都是以贵族文学和散文为主。从贵族文学或是散文中间，决看不出文学的“生命的连续”，不过是“死的”“断片的”连续罢了！要想看出“真正的文学历史”，“有生命的文学历史”，非从“音乐”和“平民的音乐”，“平民的有韵文”里边去找，决定

不会成功！（《中古文学概论》第一编《音乐与文学》）

依照徐嘉瑞拟定的这四项指标去衡量，现存汉唐时代的诗词文赋，几乎不是出自班固、贾谊之类的知识阶级之手，便是出自扬雄、司马相如之类的官僚与建安七子之类的有名望的贵族之手，它们都是贵族文学的典型。而这一时代的平民文学，只能够在歌谣、乐府这一类协律，而且可以歌唱的音乐作品里面找到，像汉魏乐府里的相和歌辞，六朝乐府里的鼓角横吹曲、清商曲辞、舞曲歌辞，这些都是平民文学。在徐嘉瑞看来，讲中古文学史，因此最应当突出的，也就是可以作为平民文学之代表的乐府和歌谣，最值得重视的，也莫过于文学史和音乐史的关系。

所以，在他的这部《中古文学概论》里，第二编《平民文学》占的篇幅最大，大到几乎为第四编《贵族文学》的三四倍。而在《平民文学》这一编中，徐嘉瑞对相和歌辞做的分析，相对来讲，又最为细致。他称赞相和歌辞的内容丰富，“从宫廷、帝王、后妃起，一直到兵士、走卒、旷夫、怨女，凡社会上所有的大事，大概都有，不像那词赋派，只是一味的阿谀奉迎，描写宫殿羽猎之美”；又称赞它“词语真率”，“使文学的神味，活活泼泼，跃于纸上。不像词赋派的文章，只是向字典里翻弄些死字，填在上面”。相和歌辞就因为“所描写的方面，非常复杂，非常宽广。凡社会上所有的事，他们都注意到”，甚至于也比后来“只是描写男女两性的恋爱”的清商曲辞等，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平民文学》第三章《相和歌辞》）。当然，就是在后来的六朝文学里边，它的正统，也应该归于“当时的一

班平民和外国人民”之手(第四章《六朝平民文学》)。

中古文学的面貌,经过徐嘉瑞的这样一种描述,也令为他写序的胡适更加确信,在汉代的乐府歌辞中,本就有许多平民的“绝妙的文学作品”,只不过,一直要到曹操父子“大胆地模仿提倡那自由朴茂的乐府诗体”,“平民文学的价值方才大明白于世”,此后的诗人,大多也都要经过一个模拟古乐府的时期,民间文学,因此一跃而升为正统文学。南北朝时期的贵族文人,起初也在模拟汉魏乐府,可是到了萧梁以后,活跃在民间的“新乐府”,又渐渐“逼人承认”了它的价值,那种“简短精彩”的六朝民歌,于是成为时髦的诗体,南北朝民歌,因此又从民间一跃而成正统文学的一部分。像这样一个民间文学升作正统文学的过程,不但是一般文学史的常态,也正是中古文学之“升沉的大步骤”。

与徐嘉瑞拈出乐府、歌谣,作为平民文学的思路相接近,同时也抱有“文学史与音乐史发达路径相同”的观念,而着意突出音乐元素的,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科的朱谦之。

1923 年,朱谦之在长沙以“中国文学与音乐之关系”为题做讲演,在这篇后来收入他的《音乐的文学小史》一书的讲演稿里,一开头,他就把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和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称作文学史的“旧派”,而把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当成“新派”之作加以推崇。他批评刘师培“非偶词俪语,不足为文”的看法,是太把文学“图式化”了,他也像胡适他们一样,以为文学的本质应当是“情感”。只不过比起胡适,他又多出一点,就是强调在所有表达情感的文字当中,还

应当有美文和应用文的区别。

这一来，朱谦之就走了一条折中的路线。一方面，他批评阮元、刘师培的“凡偶皆文”，是形式主义的；可是另一方面，却又赞扬他们，是继承了晋宋之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的原则。更进一步，从阮元、刘师培那里，他还发展出自己的“韵即声音，声音即文”的观点。就是说，文学中的情感和声韵，应当合二而一，“只那有‘情辞声韵’的才算活文学”，中国文学应以音乐文学为它的正宗。在这一观念下，他以为像《孔雀东南飞》、《上山采蘼芜》这样的韵文，就比周秦诸子里的《说符》、《说林》更接近于文学；又比如说唐传奇，也就不能跟元明时代人据以排成的戏曲相比。《礼记·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他认为，这才是有关“文学”的最经典的论述，因为它不但把情感、音乐、诗歌三者融合为一体的关系，讲得最为透彻，也道出了中国文学的好处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既不肯像刘师培那样，退回到讲究甚至拘泥于声韵、对偶的文学传统，也不肯像胡适那样，脱离甚至于打破由韵律、对仗构成的文学传统的屏障，朱谦之选择的的办法，是保留传统中的一部分，也就是保留汉语言的“声韵”特征，只不过他的这个“声韵”，又并非汉语本身的声韵调，却是与宋词元曲一脉相承的，是有歌词与之相配合的音乐。这个办法，今天看来虽然有些奇特，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到在当时，他是力主以白话的诗剧来普及和推广平民文学，倡导“用现代的白话，建设比昆曲更进一层的‘诗剧’，并且这种‘诗剧’是可歌

唱的，并且平民都可以歌唱的"，在他讲到文学史的时候，贯彻自己在当代文学中的主张，格外看重与音乐相关的文学，大概就不难理解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梁启超写下了他的未完稿《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梁启超的这个"美文"，首先，指的是民间歌谣，相对于诗人写下的具有"人工美"的诗作，它们更表现出一种"自然美"来；其次，指的是乐府诗，它们是在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梁启超也表现出这样一种取向，就是要把乐府当成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裁。他说，自从汉武帝成立乐府机构，采撷歌谣，使乐府大大的兴盛，直至东汉末年渐趋消沉，乐府之于汉代，便仿佛诗之于唐、词之于宋，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因此，他要讲述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实际上，便也是"以汉乐府为中坚，而上溯古歌谣以穷其源，下附南北朝短调杂曲以竟其委"(《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序论》)的。

在《汉魏乐府》这一章，梁启超根据郭茂倩所编一百卷的《乐府诗集》，还特意划出了从事乐府诗研究的基本文献的范围。他把《乐府诗集》中的近代曲辞、新乐府辞等不入乐的作品，包括杂歌谣辞等徒歌之谣，以及舞曲、琴曲等六朝以后人的拟作，都剔除在乐府诗的研究范围之外，狭义的乐府，他规定，只存在于郊庙、燕射、鼓吹、横吹、相和、清商、杂曲这七类歌辞当中。

紧随其后，陆侃如于 1926 年出版了《乐府古辞考》，在梁

启超的基础上,进一步论定乐府诗的研究范围。他一面继续根据"新文学"的观念,指出即使在汉乐府中,也应当分别出民间歌谣与文人作品这两个大类,一面依照同音乐的关系之远近,把乐府诗分成入乐的与不入乐的两种,以为只有够上"创制"、"入乐"这两条标准的,才能算是"真乐府",也即他所谓"乐府古辞"。而在这一原则下,他也再度重申梁启超对乐府诗研究范围的规定,将《乐府诗集》第五十七卷以后的琴曲、与杂曲重复的近代曲、不入乐的杂歌谣以及未被于声的新乐府,统统划出乐府古辞之外。这种文献的考辨、清理工作,为乐府诗研究在此后二三十年间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相当好的基础。

即以 1931 年他与冯沅君合写出版的《中国诗史》一书为例,其中《乐府时代》一篇,对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就有更加周密的考订,对乐府诗的发展脉络,也有更清晰的梳理。大体上,他们是把汉乐府当作乐府诗中最有价值的作品的,而汉乐府又分三类:第一类,为始于汉高祖时代的郊庙歌、燕射歌和舞曲,由贵族特制,多用在祭祀上;第二类,为始于吕后时代的鼓吹曲和横吹曲,从外国输入,作者的成分和地位,介于贵族、平民之间;第三类,为始于武帝时代的相和歌、清商曲与杂曲,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当汉代乐府诗的高峰过后,模拟作品日渐增多,乐府诗的价值已不如前,但南北朝时代,仍有一段回光反照的时间,南朝乐府以清商为主,北朝乐府则以鼓角、横吹为主。

在表彰"平民文学"、"民间文学",与 1920 年代初学术界

同时兴起的"整理国故",这两股思潮的鼓荡之下,乐府诗因为被看成是民间文学的词、曲之源头,对它的研究和整理,一时之间也成大热门。随后,还陆续出现了像罗根泽《乐府文学史》(1931 年)、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44 年)、余冠英《乐府诗选》(1950 年)、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1955 年)这样重要的研究论著。

罗根泽是 1927 年考进清华研究院的学生,毕业后在大学里教文学史,于是编写了《乐府文学史》的讲义。他在讲义的《叙说》中,曾坦率地交代,自己所编这一部由汉代到中唐的乐府诗史,深受到梁启超和胡适的影响;而在乐府诗当中,他最看重的,也是吟咏社会问题的平民乐府。

1933 年,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另一名学生萧涤非,在老师黄节的指导下,完成了《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毕业论文。

黄节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同时为清华研究院的兼任导师,他也是最早在大学里开设乐府诗专门课程的一个人,1923 年就完成有十五卷的《汉魏乐府风笺》。这部仅仅选取汉魏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作为笺注对象的《汉魏乐府风笺》,之所以以"风笺"为名,用的正是《毛诗序》上所说"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的意思。萧涤非的毕业论文,就是在听了黄节汉魏乐府的课以后,受到启发而撰写的,到了晚年,他甚至宣布自己写这篇论文,为的就是要说明乐府民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因此,它"虽名为《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其实就是汉魏六朝民间文学史,说得更确切点,也就是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史,因为从数量到质量,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从

对当代到对后世诗人的积极影响，乐府民歌，尤其是两汉乐府民歌，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在诗歌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后记》)。

在对待乐府与诗的关系方面，比起梁启超、陆侃如他们，萧涤非似乎更相信民间具有自发的创造力，而视乐府为至高无上的文学体裁，断言"一切诗体皆从乐府出"。当然，在确认文人的创作乃源于民间的这个前提条件之下，事实上，他也给文人乐府保留了一席之地。比如说，他讲的两汉乐府，实际上，还是由"汉初贵族乐府"、"两汉民间乐府"、"东汉文人乐府"三部分构成；他讲魏晋南北朝，实际上，也包括有各时代文人乐府的专门章节。这就使他号称"汉魏六朝民间文学史"的这部乐府文学史，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在内容上，反而更趋近完整——既看重被视为民间的无名氏之作，也不偏废贵族的和有名文人的作品。

但是，与徐嘉瑞、朱谦之以及陆侃如等人的著作，同时非常强调乐府诗的音乐性，又有所不同，在萧涤非看来：

> 乐府主声之说，此自当时言之则可，若在今日，则惟有舍声求义。盖其声久佚，不可得而闻之，所谓《郊祀》、《鼓吹》、《相和》、《清商》，等一无声之诗耳。而其义则犹存乎篇章之间，昭然可见，阐而明之，择善而从，则乐府虽亡，而其精神实未尝亡。(《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引言》)

"若在近日，则惟有舍声求义"，撇开难以复原的音乐，而

去分析、探究乐府歌词的内容与含义，这是把声音还原为文字，把乐府的文学史同音乐史剥离开来的一条研究路线，乐府文学史开始向历史学靠拢，借用历史考订和叙述的办法。萧涤非的兴趣，事实上也的确是在乐府诗的本事以及它的背景的考订上面。比如，谈到《陇西行》，他就会引出《汉书》的《地理志》和《赵充国传》，以陇西一带民风强悍、虽妇女也“豪健有丈夫气”来作印证；又比如，谈到张华的《轻薄篇》，他也会征引《宋书·五行志》等材料，来说明当时的贵游子弟和士大夫确如歌词所写，过的是一种放诞的生活。在他看来，乐府诗不仅为诗，更是观察一个时代“政教之隆污，民族之兴替”的窗口。

萧涤非的研究，对于已经无法恢复其声音原貌的乐府诗来说，无疑是一个相对稳妥的、比较有效的示范。

1955 年，王运熙把他自复旦大学毕业留校后研究乐府、于 1948 至 1950 年陆续写出的，一系列有关南朝吴声西曲的研究论文，结集为《六朝乐府与民歌》出版；稍后他的关于乐府机构、杂舞曲等等的研究论文，也收入《乐府诗论丛》一书，正式出版。他的这些论文，弥补了过去包括萧涤非在内的研究者，在南朝乐府上的研究不足，举例来说，比如在有关吴声、西曲的一系列论文中，他就逐一考订了《前溪歌》、《阿子歌》等吴声西曲产生的时代、地域及历史渊源。他考吴声、西曲的本事，也会像萧涤非一样，考虑到它们产生的社会背景，可是有时他的考订，就会做得更细致更深入，比如萧涤非讲《团扇歌》，还只说到它，“末首以团扇自喻，词旨蕴藉温厚，得

风人之致。然自是南方女性”,可是要看王运熙的《团扇歌考》,却是先从不同文献记载它的作者或为王珉、或为王献之,从这一点入手,然后,引出六朝士大夫喜捉白团扇并有在上面题句的习惯,进而说到《团扇歌》也为北朝贵族所喜爱,就这样一步一步,把《团扇歌》的流传之广以及它为什么广为流传的原因,抽丝剥茧般地交代得一清二楚。

与乐府、歌谣在文学史上获得越来越高的赞誉,同时带来与之相应的研究热忱,恰成对照的是,对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南朝有名作家诗歌的评论,却是越来越低迷,越来越负面。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到 1941 年抗战期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写下的有名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

在《宫体诗的自赎》这篇文章中,闻一多历数从谢朓之死,到陈子昂出生的这段时间,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第一流诗人,这样一个他所想象的文学史事实,把导致文学史衰败的原因,归结到宫体诗身上。他说:南朝以至隋末唐初流行的宫体诗,根本就是一种文学堕落的表现,由那些诗营造出来的宫廷气氛,只能用“淫荡”两个字来形容,不管它们是咏人的,抑或咏物的——咏物,不过是“以物代人为求满足的对象”——都很“变态”和“堕落”,而这些变态、堕落的宫体诗,也恰好就是衰老、贫血的南朝宫廷生活的产物。本来,北方新兴民族的热与力还可以拯救它,只可惜北方反而被南方的文化所征服,于是,要拖到唐代,一直要到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的作品出现,才算有所谓“宫体诗的自赎”。

闻一多的学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校任教的王瑶,后

来在《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收入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的文章当中,也像他的老师一样,把齐梁诗的发展,说成是宫廷士大夫堕落过程的表现。而除了为满足性感写作的宫体诗,王瑶的批评对象,更扩大到了讲究用典、协调声律的这一时期几乎所有诗歌的身上,它们几乎都因为是"一步步地趋于纤弱浮肿的病态和变态",而受到鄙薄和斥责。

从起初的,由语言、文体角度所作的文学批评,发展到后来,变成思想、道德领域的批判,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日益升温的负面贬低的评价,多多少少影响到研究者对这一段文学史的热情和投入,而这种低投入的状况,差不多一直要持续到1980年代才告结束。

4

对外来文化影响的重视与佛教文学研究

梁启超在1920年所作《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写道：自有鸠摩罗什经论出，中国的"翻译文学"即告成立，"盖有外来'语趣'输入，则文学内容为之扩大"。这些佛教经典，在他看来，不仅为思想界"辟一新天地"，对于一般文学的影响，也表现为：第一，是扩大了汉语词汇，产生出像因缘、果报、涅槃、刹那、众生等等的新的语汇；第二，是带来语法文体的变化，于骈文、古文之外，产生了一种"组织的解剖的文体"，像后来的禅宗语录，就对宋儒影响至深；第三，是发展出一些新的文学情趣来，其中像小说、戏曲这些在近代被称作"纯文学"的文体，同翻译文学的关系尤其密切。

在这里，梁启超提到了马鸣菩萨。他说，马鸣的《佛本行赞》，"实一首三万余言之长歌，今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

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他还说，马鸣的《大乘庄严论》，“则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说”，如“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缋，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现于一般文艺。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

1924年，为欢迎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的到来，梁启超在北京师范大学作了一篇题为《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的演讲。演讲中，他再次提到印度大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说它被译成华文以后，“风靡一时，六朝名士几于人人共读”。当着泰戈尔和听众的面，接后，他又发表了以下的读后感想，说：“只怕《孔雀东南飞》一路的长篇叙事抒情诗，也间接受著影响罢。”

在乐府诗里面，《孔雀东南飞》恐怕是在1920年代前后，被提到最多的一篇作品。这首诗，最早出现在徐陵编的《玉台新咏》第一卷，标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撰者署“无名人”。诗被排列在繁钦和曹丕两人的诗作中间，说明编者是把它看成汉末、也就是诗中主人公焦仲卿时代的作品的。后来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也把它收在“杂曲歌辞”类，称之为“古辞”，也以为它就是汉人之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般人的看法，都以为它是建安时期的作品，只有宋代的刘克庄，曾在他的《后村诗话》里面，以汉人不曾过有这种长篇叙事诗为根据，怀疑它是六朝人的拟作。

当梁启超在1922年发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时候，他是把《孔雀东南飞》当成“写实诗”的一个例子，按时序，放在汉乐府《孤儿行》之后、左思的《娇女诗》之前的。稍后，他发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也依然把它当作建安时代的一部“写实”作品。可是时隔不久，就在欢迎泰戈尔的这场讲演当中，他就怀疑起这首诗的创作年代，应该是在《佛所行赞》被翻译成华文之后的六朝，他疑心这首诗，跟印度佛教，应该有一种渊源关系。

尽管梁启超在正式发表的文稿中，也反复强调自己并没有其他证据，但是疑问一旦发出，立刻引起连锁的反应。正在北京大学主讲汉诗的黄节看到演讲稿，马上写信向梁启超询问：说《孔雀东南飞》是六朝后所作，有何证据？梁启超没有函复，却由陆侃如代师作答。陆侃如为此写了一篇《孔雀东南飞考证》的文章，文章围绕着诗里提到的“华山”、“青庐”和“龙子幡”三事，加以考证，考证的结果，证明该诗确实出于齐梁人之手。然而陆侃如的举证，很快遭到黄节的质疑，黄节根据这首诗版本不齐、句多古拙的特点，同时参照曹植、王粲的《出妇赋》等，详加辩驳、讨论，最后重申他的结论，以为此诗必为汉人之作，只是曾经过六朝人的增改润饰。

卷入这首诗写作年代之争的人，这以后越来越多，有人主张“建安”，有人主张“六朝”。胡适响应这场争论，也写下了《〈孔雀东南飞〉的年代》一文，他的意见是，这首诗应该作在佛教盛行中国以前，时当建安以后不远。道理有两点：第一，是诗中还看不到一点佛教思想影响的痕迹。像这样一出

生死离别的大悲剧，如果它是被写在佛教盛行以后，其中至少会表达出来生、轮回、往生一类的希望，可是在焦氏夫妇离别、焦仲卿别母的几句诗里，都不曾看到；第二，是《佛本行赞》、《普曜经》等长篇故事，译出后，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梁启超说它们"译成华文以后也是风靡一时，六朝名士几于人人共读"，这是"毫无根据"的，六朝名士欣赏的，实际上是道安、支遁、僧肇一流的玄理，而非此种几万言的俗文长篇记事。

黄节的辨析与胡适的论证，比梁启超突如其来的联想，显然都更加合情合理。也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余冠英，后来在编他 1950 年出版的《乐府诗选》的时候，就明确接受了黄节和胡适的判断，以为《孔雀东南飞》虽然产生在汉末，见于记录，却是陈朝，而这中间的传播，主要靠的是民间歌人的口头传唱(《乐府诗选序》)。

然而，像梁启超这样大胆的猜测，还不是最早的，将佛教与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牵扯到一起的例子，在刘师培 1905 年于《国粹学报》发表的一则读书随笔《贾生鵩赋多佛家言》中，就曾经有过"西汉之时，佛教未入中国，而贾生鵩赋则多佛典之言"的断言。刘师培以《鵩鸟赋》与佛典相比较，分析这篇赋至少有六处内容与释典相通，比如，像赋中"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续转兮，变化而嬗"这句话，他说，和佛家"不生不灭之说，所谓其来无始，其去无终也"的观念，就很一致。至于这种看似"轮回"的思想，怎么会出现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他也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因为《鵩鸟赋》"半出于楚骚，半源于庄列"的缘故(《国粹学

报》4)。

说《鹏鸟赋》"多佛家言",当然不大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可是,说《孔雀东南飞》与《佛本行赞》有关,也许就不能称它为突发奇想,东汉以后,佛教在中土日益蔓延、炙手可热的事实,逼迫人不得不去思考,佛教对文学,究竟怎样渗透、怎样影响?

从1920年起,鲁迅在北京大学讲小说史课,讲到六朝时期,对于佛教的影响他就有这样的描述:

>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

鲁迅还举出梁代吴均《续齐谐记》所载"阳羡鹅笼"的传说,与吴时康僧会所译《旧杂譬喻经》中的若干故事相仿佛,以为例证,用来说明当天竺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流传于世,"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这样一个佛经传播与接受的过程。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早有人说,受到过日本学者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影响,因盐谷温的书,1919年就在日本出版。但仅就汉魏六朝这一段来看,鲁迅的教材,跟盐谷温的思路,还是有很大差别。只不过,盐谷温讲到东汉以后的文学,也相当关注它们跟佛教的关联,比如他也指出,

汉代以后，方言混杂，加上魏晋以来，戎狄入内地杂居，中原音韵大形混乱，“恰当是时佛典底翻译偕天竺底声明学传来，整顿汉族底音韵之必要即应时发生，学者底研究渐渐开始了”（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孙俍工译，开明书店 1929 年）。说魏晋南北朝的音韵之学，曾受到印度声明学的启发，这虽然不是盐谷温的创造，然而旧话重提，却也恰好迎合了一波新的研究风气。

这新的一波研究风气，便是把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放到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

1927 年，郑振铎在他主持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郑重发表了宣言式的文章《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由他在文章中指点的三条新途径，其中第一条来看，便是“要研究中国文学究竟在历代以来受到外来的影响有多少”。而从这个角度，回过头去看唐代以前的文学史，他就强调，佛教的影响力，不容低估。他说，那时“最初是音韵的研究，随了印度的佛教之输入而输入，而印度及西域诸国的音乐，在中国乐歌上更占了一大部分的势力。其后，佛教的势力一天天的膨胀了，文艺思想上受到无穷大的影响”。而在 1932 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他更加明确地把他所谓“中世”、也就是东晋南渡以至明代正德这一千多年间的文学成就，说成是中国与印度，在宗教上结婚的结果。他说，由于印度文学的输入，“我们乃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变文，像戏文，像小说等等出来”（第十三章《中世文学鸟瞰》）。这里提到的变文、戏文和小说等

几种新文体,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恰好都属于平民的、民间的文学,这也就是说,印度文学给中国中世文学带来的,还不只是一些新的文学体裁,而且是民间文学的发展方向。

当然接下来,真正地把魏晋南北朝佛教与文学之关系的这个话题,引向深入的,还是陈寅恪在1930年代,于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讲授佛教文学、世说新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等课程时,发表的一系列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论文。

比较早的一篇,是他1930年发表的论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

在这篇论文里,陈寅恪首先指出,《三国志》的《曹冲传》和《华佗传》里,已经有佛教故事辗转因袭、杂糅附会在其间。他举的两个重要例子,一个是“曹冲称象”,据他说,这个故事,应当是附会北魏《杂宝藏经》里的佛经而来的,因为象在当日,并非中原的动物。尽管《杂宝藏经》的汉译,比《三国志》记载的时间要晚,可是并不妨碍说,这故事本身,早已传到了中土。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华佗,据他说,“华佗”原为五天外国之音,古音即天竺语 agada,是所谓“药”的意思,《华佗传》里讲到他有种种神奇的医术,那都是民间比附着印度的神话故事敷衍出来的。在论文里,陈寅恪还附带提到竹林七贤,他说,这“竹林”二字,应当就是佛教名词“Velu”或“Veluvana”的译语,指的是释迦牟尼的说法之处。

陈寅恪游学欧美,在此之前,学习过梵文、蒙文、藏文等多种语言,也深知比较语言学在欧美发达的情形。在1927

年发表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里，他就曾经利用自己掌握的蒙、藏、梵语，考证出《大乘稻芊经随听疏》的翻译者、也就是唐代吐蕃沙门“法成”的名字，在蒙文里，应该写作“答哩麻悉谛”，在梵文里，应该写作“Dharma-Siddhi”，在藏文里，应该是“Chos-grub”，而“法成”，则是他的中文意译之名。这个法成，在他看来，和玄奘一样，在中外交通史上应当有很高的地位，“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金明馆从稿二编》)。

同一年，陈寅恪还发表了一篇《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在这篇《跋》里，他把马鸣菩萨《大庄严论》的鸠摩罗什译本，拿来和路得施整理的原梵文残本相比照，同时，赞扬鸠摩罗什在翻译史上的成就，“仅玄奘可以与之抗席”(《金明馆从稿二编》)。

在论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发表以前，陈寅恪还发表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等等涉及到佛教与小说史及文字学的文章。从《三国志》的《曹冲传》和《华佗传》的阅读当中，找到印度佛教和梵语的“灵感”，因此，可以说并不偶然。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钢和泰(A. von Stael Holstein)这名学者。钢和泰原是一位精通梵文的爱沙尼亚贵族，1917年来到北京，应胡适之邀，在北京大学开设梵文、藏文以及古印度宗教史等等课程。在1923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上，他所发表、由胡适亲自担任翻译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借梵音来考订中国古音，

并指出“在那些外国字的汉文译音之中，最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梵文的密咒一类”，给当时的音韵学界，带来很大的震动。正像魏建功说的那样，它使人意识到，研究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古音，一定“要注意到梵音”这件事情。这是由于，“印度的经典译成中文，而他的梵字因为宗教关系保持他的特性在各种咒偈中，因而给译经典的学者——当时的和尚——有创造字母的启示和参考”(《古音学上的大辩论——〈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引起的问题》，收入《魏建功全集》3)，这样的一段历史，是不该被忽略掉的。

钢和泰自己就曾把《大宝积经迦叶品》的梵本、藏译本、四种汉译本，放在一起，逐段比照，编成一部《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刊》，于1926年出版。在梁启超1924年3月为他撰写的序言里面，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学界拜钢先生之赐实在多多”这样的赞誉之词。而从1930年代初开始，钢和泰就和陈寅恪、雷兴等学者一起，连续数年，研读《妙法莲华经》的梵、藏、汉各个版本及其注释，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当中，陈寅恪特别留意佛教及印度文化的传入，也是并不奇怪的。

1934年末，陈寅恪再写下一篇关乎南朝诗歌声律的《四声三问》，文章考证出，齐梁时代的“四声说”，乃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的三声。

写这篇论文，陈寅恪说，是受了王国维《五声说》的启发，不过王国维的文章，主要还是在讨论魏晋以上的“五声说”，与宋齐以后的“四声说”之间，有什么差别的问题。《五声说》

的结论也很简单，王国维认为，魏晋时以宫、商、角、徵、羽这“五声”命字，代表的依然是古音的传统；宋齐以后，尽管有平、上、去、入这“四声说”的流行，“五声说”渐趋衰微，但是周颙、沈约等人编撰的《四声谱》之类，却还只为“属文而作，本非韵书”，这是因为，“其时阳类已显分三声，与阴类三声及入声而七，用之诗文，则阴阳可以互易，而平仄不能相贸，故合阴阳两类而为四声”（《五声说》，《观堂集林》卷八）。说到底，“四声说”，其实只适用于诗家。

王国维的这一论述，基本上，可以说是在吸取了明代以来的古韵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成果，包括有陈澧的“古本音不同今韵说”、戴震的“阴阳二声相配说”和段玉裁的“古四声不同今韵说”，等等；当然也可以说，他的论述，也仍然没有超越出传统声韵学的范围。

事实上，在陈寅恪的《四声三问》发表之前，对于齐梁时代“四声说”的解释，大体上都越不出传统声韵说的系统。比如，刘师培在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里，便曾说永明声律的发明，是由于江左人士本来就喜言双声，衣冠之族本来就多解音律，有了这样一个熟悉声韵的土壤，等到周颙、沈约他们再提出倡议，声韵之道便得以大行其事了。

然而，陈寅恪关于“四声”的三问三答，却以其特别关注中古文化史中的中外交流的背景，牵入佛教及印度的元素，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而使历来有关“四声说”的解释，根本掉转了方向。

陈寅恪认为，中国文士创造的“四声说”，实际上，是对当

时转读佛经之三声的模仿，于平、上、去三声之外，另加一个入声，总计为四声。他说，这所谓转读佛经的三声，又出自印度古时声明论的三声，因为天竺围陀的声明论，就是依声之高低，分别为三的。当佛教徒转读经典的时候，这三声之别，也就随之输入中土，中国文士依照它编撰声谱，从此，便把转读佛经的声调，应用到了中国的美文上面。

但问题是，“四声说”为何恰好出自南齐永明年间的周颙、沈约之手？

陈寅恪解释道，这是由于南齐武帝永明七年的二月二十日，发生了竟陵王子良集合善声沙门于京邸，制造经呗新声，这样一个考文审音的大事件。而从《高僧传》的记载中，也可以知道，从宋之中叶至齐之初年，在建康，本来就居住有不少能讴经呗的“善声沙门”，他们有的是来自西域的胡人，有的就是本地的土著居民，在与审音文士，像沈约、谢朓、王融、周颙这批人的往来当中，有许多相互的影响，比如鸡笼西邸，就既是审音文士抄撰的学府，也是善声沙门结集的道场。所以，在永明七年以前，“建康之审音文士及善声沙门讨论研求必已甚众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结集，不过此新学说研求成绩之发表耳”。可以引为旁证的，还有曹植鱼山（东阿境内）制契的传说，一见于刘敬叔的《异苑》，一见于刘义庆的《宣验记》，因为二刘都生在晋末宋初，也可见此一传说，在东晋末年已经流行，这当中，便暗含了对于善声沙门和审音文士合作的影射。

由此，陈寅恪得出了“四声说”是为外来之理论的结论：

> 宫商角徵羽五声者，中国传统之理论也。关于声之本体，即同光朝士所谓“中学为体”是也。平上去入四声者，西域输入之技术也。关于声之实用，即同光朝士所谓“西学为用”是也。盖中国自古论声，皆以宫商角徵羽为言，此学人论声理所不能外者也。至平上去入四声之分别，乃摹拟西域转经之方法，以供中国行文之用……然则五声说与四声说乃一中一西，一古一今，两种截然不同之系统。论理则指本体以立说，举五声而为言；属文则依实用以遣词，分四声而撰谱。

对于“四声说”产生的原因，另辟思路，重作分析，1990年代，平田昌司撰文指出，这是由于陈寅恪对当时的“国语语法和欧化诗格律”有一种特殊的“观感”。平田昌司以为，陈寅恪并不欣赏时新之人直接套用西洋文法和西洋句读的做法，而更喜欢强调中国语文的特殊性，在解释1932年为清华大学的考生出题“对对子”的时候，他便这样说过：“凡中国之韵文诗赋词曲无论矣，即美术性之散文，亦必有适当之声调。若读者不能分平仄，则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竟与不读相去无几，遑论仿作与转译。”这说明在他的心目中，声调是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研究中国文学最值得重视的特征之一(以上参见平田昌司《读陈寅恪〈四声三问〉》，载《学人》第十辑)。

陈寅恪的这个意见，与提倡“白话文学”的胡适他们把永明声律的发明，视为文学“遭一大劫”，甚至譬喻它“如缠小脚本是一件最丑恶又是最不人道的事”(胡适《白话文学史》上

卷第一编《唐以前》第八章《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学趋势》)，自然相左，可是与刘师培讲中古文学史，而一意拔高六朝文，目的在于恢复所谓讲究声律对偶的六朝文学传统，也不完全相同。陈寅恪刻意调动有关古印度以及佛教的文献和知识，刻意在中古史的研究中，加入中国如何接受域外文化的思路，为的其实还是要说明，当六朝之际，“神州政治，虽为纷争之局，而思想自由，才智之士亦众，佛教输入，各方面皆备，不同后来之拘守一宗一家之说者”(陈寅恪《〈大乘义章〉书后》)。

正是由于对六朝时代的思想、文化格局，有这样一个“自由”的、“不拘守一宗一家之说”的大判断，才使得陈寅恪把一个过去只是局限在传统音韵学的系统之内、仅仅靠了韵书和韵文来解决的纯粹专业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涉及到中外交通的文化史上的大问题，从而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史学界，引起巨大的学术反响，即如饶宗颐所形容，“是说既出，学者多从之”(饶宗颐《印度波儞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收入饶宗颐《梵学集》)。

紧随陈寅恪的，比如就有刘大杰。在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相关段落，不但有对《四声三问》一文的毫不犹豫的大段援引，还有像“使我们对于四声说的成立，由于佛经转读的影响实无可怀疑”(《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章《南北朝与隋代的文学趋势》之“声律说的兴起”)这样的绝无怀疑的肯定。

稍后，逯钦立撰作《四声考》(收入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考论“四声说”创自刘宋的周颙，也是在陈寅恪的基

础之上，作更加详细的论证。逯钦立认为，“四声说”的发明，关键在于“纽”的发现，周颙以体语“壬衽任入”为“纽”，与印度体文以“波颇婆摩”为“纽”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他还根据《高僧传·慧叡传》“灵运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的说法，推测这一做法也是受了谢灵运《十四音训叙》的启发。所以，他说，周颙分判四声、沈约撰著《四声谱》，创为文学新的韵律，主要目的，其实还在于改造旧的五言诗体，而这旧体诗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作诗“阐缓”“冗长”的谢灵运。

由齐梁时代有关“四声说”产生原因的探讨，上溯而至对晋宋间谢灵运撰著《十四音训叙》的关注。原来，黄节在他的《谢康乐诗注序》里已经指出过：“康乐之诗，合《诗》、《易》、聃、周、《骚》、《辩》、仙、释以成之。”而在 1938 年出版的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里，于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统》也特别设有“谢灵运”一节。汤用彤说：

> 康乐一生常与佛徒发生因缘。曾见慧远于匡庐，与昙隆游嶀嵊，与慧琳、法流等交善。著《辨宗论》，申道生顿悟之义。又尝注《金刚般若》。(《文选》注引之。又见《广弘明集·金刚经集注序》。)与慧严、慧观等修改大本《涅槃》。近日黄晦闻先生论康乐之诗，谓其能融合儒佛老，可见其濡染之深。

尽管对谢灵运在佛教理论方面的修养评价不高，称其“于佛教亦只得其皮毛，以之为谈名理之资料”，但是汤用彤对谢灵运一生中与佛教有关的事迹，还是做了一番考察，其

中就考得《十四音训叙》是在元嘉七年、谢灵运四十六岁时写下的。同时，对于谢灵运在佛教史上引发的“名人效应”，他也有一个估价，认为“康乐一代名士，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虽性情偏激，常与世龃龉。然因其文才及家世，为时所重。故《涅槃》之学、顿悟之说虽非因其提倡，乃能风行后世。但在当时，谢氏为佛旨揄扬，必有颇大之影响”。

及至后来，在兴膳宏所作《〈宋书·谢灵运传论〉综说》的论文里，还可以见到对谢灵运《十四音训叙》之于佛教、梵语之关系的，更其深入的分析。兴膳宏说，正因为参与过翻译南本《涅槃经》的谢灵运，曾向慧叡学习梵语，因此，他才有可能写出堪称“梵语入门书”的《十四音训叙》，而从他已经学会了使用反切法，来表示五十个梵音字母的读音这一点，也能够看到，他对梵语和汉语的音声结构，实在是有很好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所以，“尽管他确实没有对四声具备明确的认识，但要说他一点没有意识到汉语的内在音律，这是我很难相信的。我以为只能说他没有把作为语言学者所获得的知识应用于文学领域而已”（彭恩华译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

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谢灵运传”条，曾引述兴膳宏的上述看法，只不过他的意见是，《十四音训叙》的作者，应当为慧叡：“细绎僧传文义，及《悉昙藏》五所引《玄义记》称‘宋国谢灵运云’之言，则此书实不出灵运手，乃慧睿之作。然灵运颇通梵语音声，惠睿之书当亦受其启发，故每引谢语。”此外，他还补充说道：唐慧均所著《大乘四论玄义记》，

引谢灵运说梵字五十字音声，有“反语成字”之言，“足以窥见南朝音声之学及四声理论与悉昙研究之密切关系”。

当然，与上述陈寅恪等人的思路不同，也有人依然相信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文学会按照它自身和谐柔美的要求，自然而然地调整它的声音韵律，因此，并不赞成陈寅恪这种牵入佛教及印度的元素、强调“外因”作用的解释。

比如，郭绍虞在《永明声病说》(《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的文章中，就主张早在“四声说”发明之前，古人已经审音甚密，而当文学走上骈俪之路，必然就会由形的对偶，进一步发展到音的配合，陈寅恪的意见固然有理，“但只能说是受转读佛经的启发才完成这个文字音韵学上的新发明”。他认为，转读佛经，只能说是“四声成立之最近的原因”和“一部分的原因”，因为“永明以前已有声调的分别”，而这“四声”，也是语音中本来固有的。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里，谈到“永明体与声律问题”，郭绍虞还有进一步的补充意见。他说，字音的研究，魏晋之后，已逐渐为人注意，“宋齐以来，加上佛经转读的风气，于是为了要把单奇的汉语，适合重复的梵音，也就利用二字反切之学使声音的辨析，更趋于精密”。他的意思，仍是在强调“四声”的发现，不过为魏晋以来自然发展的文字审音的一个成果。他说，过去的人未必就不能够分别发音审调，只是由于以前的诗与音乐关系紧密，在韵的方面要求不严，后来，诗变成了需要“吟诵”的东西，所以才会严格地去辨别“四声”。

汉语的声调，自古便已存在，并不是某人的创造；“四声”

之名，也仅仅是在齐梁之际，由沈约、周颙等人提出，顶多可以说是他们的发现，却不是他们的发明，“发明”和“发现”应该有所区别——在音韵学家，如李新魁的《汉语音韵学》、唐作藩的《音韵学教程》中，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意见。俞敏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的文章中，更是指出，陈寅恪说“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亦当随之输入”，那是不对的，因为有这方面的戒律要求，佛家弟子不可能学习吠陀声明论，而梵呗跟 svara 也不是一回事，“说汉人研究语音受声明影响没毛病，说汉人分四声是摹拟和依据声明可太胡闹了。汉人语言里本有四声，受了声明影响，从理性上认识了这个现象，并且给它起了名字，这才是事实”(《俞敏语言学论文集》)。而饶宗颐在《印度波儞尼仙之围陀三声略论》的文章中，也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说：“印度语无四声之分，以《围陀》诵法之三声，比附中国之四声，颇多枘凿之处。”尽管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仍不乏平田昌司这样的陈寅恪的支持者，以为“根据近几十年整理出来的中亚出土文献资料判断，梵赞对四声论的影响大致可以相信”(《读陈寅恪〈四声三论〉》)。但是质疑的声音，也从来都没有禁绝过。

有趣的是，从持有两种不同意见的学者身上，似乎也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学术经验和背景：倾向于接受“四声”外来说的，大多是与陈寅恪一样，或掌握多种语言，或有着海外游学经历的学者，或者干脆就是国外的汉学家；而反对者，大多都是对本土的汉文文献更加熟悉的人。

与陈寅恪运用佛教及印度学的相关知识及文献，考察中

古史并考订“四声说”差不多同时,胡适在他1928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上卷)中,于“唐以前”,也就是汉魏晋南北朝这一编,也专门开辟了两章,来讨论“佛教的翻译文学”。在第九章《佛教的翻译文学(上)》谈到鸠摩罗什的翻译的时候,他还加了一个“附记”,特为介绍陈寅恪刚刚发表的《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胡适不但称赞陈寅恪在文章中“举的证据都很可贵”,还转引了在这篇短短的文章中,陈寅恪对鸠摩罗什的翻译所作评语,以表示自己的全面认同。

如此重视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在胡适看来,是因为:第一,当中国文学已经走到“骈偶滥套的路上”的时候,是鸠摩罗什等人,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体,唐代以后,佛寺禅门遂成为白话文和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第二,佛教文学的丰富想象力,给缺乏想象力的古代中国文学,也带来了很大的解放;第三,印度的半小说、半戏剧体的文学结构,直接或间接地启发了后代的弹词、平话、小说和戏剧(第十章《佛教的翻译文学(下)》)。以上几点理由,虽然在梁启超稍早发表的《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与翻译》等文章当中,都曾经或多或少地有所涉猎,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到,尽管在《白话文学史》里,胡适还是花了不少篇幅,去纠正梁启超在《孔雀东南飞》的问题上,夸大了《佛本行赞》一类佛教文学影响的意见,然而,他到底和梁启超一样,“对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上发生的绝大影响,是充分承认的”(《白话文学史》第一编第六章《故事诗的起来》)。

从褒扬和提倡白话文,这样一个基于现实而采取的文学

史的角度，胡适花了相当大的力气，在他的《白话文学史》里，讨论两晋南北朝佛经翻译的语言和文体，把佛典翻译这种翻译文体，正式地纳入到了文学史的论述范围。到了1943年，罗根泽在他最新出版的《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中，也用了最后整整一章，来整理和讨论作为文学批评史内容之一部分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论”。

梁启超曾经结合自己在近代翻译事业中的亲身体验，总结他对汉唐之间佛经翻译的观察，认为“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翻译文学与佛典》四“翻译文体之讨论”)。受梁启超的启发，罗根泽关注的焦点，也是在“直译”和“意译”的问题上面，从他挑选出来以为文学批评史内容的所谓“翻译论”，比如，像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说，鸠摩罗什的“嚼饭”妙喻，慧远的折衷论，玄奘的五种不翻说，还有像道宣的批评历代译经，从这些论述来看，它们所关注的焦点，大体上都还是围绕着如何解决佛经翻译之难，或者是采取什么样的翻译方式等等的问题上面。

经过梁启超、胡适、陈寅恪这一辈学者的提倡和示范，佛经翻译在魏晋南北朝研究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但是，如果去看1947年周一良发表的《论佛典翻译文学》(收入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一文，就会发现，对于有关佛经翻译与文学的研究，他还有着相当的不满，因为他认为，“近几十年来学风丕变”，“谈佛教哲学和佛教史的人固然得看《大藏经》，就是研究历史或中西交通的学者，也莫不由佛家著述获得不少有用的材料。唯独治文学或文学史的

人，对于翻译佛典还未能充分利用”。

那么，治文学或文学史的人，应该怎样利用翻译佛典呢？周一良于此有三点建议，他说：第一，汉译佛典中的许多篇章，本身就有很强的文学性，“譬如妙法莲华经里的火宅喻一段，原文便是极优美的文学作品，而罗什译文也颇足以传达原文的情趣”，又比如原文不存、仅有译本的刘宋宝云译《佛本行经》，很多段落都有文学意味，撰写文学史，一定要给这些佛典翻译文学一个重要的地位。第二，翻译佛典也可以当作寓言、故事等通俗文学来看，比如西晋竺法护所译《生经》中有关猕猴王的寓言，“充满机智、幽默和人情味”，又比如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里，织师的舅舅和外甥一同作贼的故事，也很有意思。而“像六朝的志怪小说，其中一部分多多少少也是佛典影响下的产品”，因此，“要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源流演变，佛典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连锁”。第三，以佛典翻译文学与汉文文学相比较，可以解释一些特殊的用语和文法，比如《世说新语·惑溺》说贾充后妻郭氏酷妒，“充自外还，乳母抱儿中庭。儿见充喜跃，充就乳母手中呜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这里的“呜”字，《晋书·贾充传》改为“拊”字，想避俗就雅，完全失了它的本意。这个“呜”，其实是“吻”的意思，竺法护译《生经》里的《佛说舅甥经》就屡屡用到此字，如“有呜噈者”、“因而呜之”、“授饼乃呜”等等。由此，也可见佛典翻译文学，在语文学的历史上还是相当重要的。

数十年以后，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外国表文

中梵文影响"这一条,又继续举例说明,南朝时的外国表文,有许多都接受了梵文影响,如称宋帝为"大宋扬都圣王无伦"、"扬州城无忧天主"、"扬州阎浮提震旦天子",这种以首都"扬州"与天子连称并冠以"大吉""无忧"等词的习惯,本来都属于天竺;而对中国,或称震旦,或称真丹,也是梵文"秦"的异译,这些都足以"说明五六世纪时东南亚各国文化受天竺文化及梵文文体之影响极深,颇疑各国表文即以梵文书写者也"。

退回去若干年,退回到梁启超、鲁迅、陈寅恪、胡适、汤用彤等人,不约而同地研究起佛学以及佛学对中国文学所产生影响的时代,假如把周一良的上述提议,放到那样一个时代去看,也许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突出的重要的意义,可是仅仅才过去十几、二十几年,学术界对佛教翻译文学的热情就逐渐减褪,越来越淡薄,甚至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出版的、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里,因为叙说到魏晋南北朝文学,而单独设有《佛经翻译》一章,就受到游离于全书结构之外的批评。佛教与佛教翻译文学,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视野中最终消失,这一点,既是让人深感无奈,也是让人深以为憾的事情。

5

对本土宗教的认识与道教文学研究

1920 年代初，鲁迅在他任教的北京大学开了一门小说史的课，1923 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这门课最初的讲义。从讲义的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以及第五、第六篇的《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之上、下这几篇当中，都可以看到，鲁迅对汉魏六朝小说与道家、佛教之间的关系，大有兴趣，也许是因为他从来就相信，“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1918 年 8 月 20 日《致许寿裳》)。

那么，鲁迅又是怎样来阐释道教与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之关系的呢？

鲁迅先从说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小说”这一概念入手。他首先列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一目所著录的小说，其中有《伊尹子》、《鬻子》、《师旷》等，然后把它们，与《汉书·艺文志》“道家”和“兵阴阳家”目下著录的同名书籍，放在一起比较，经过比较得到的结论，就是说，业已亡佚的这一类“小

说”，本来大多具有“依人则伊尹鬻熊师旷黄帝，说事则封禅养生，盖多属方士假托”的性质，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小说”，大多数出自方士之手。接下来，鲁迅对《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西京杂记》、《飞燕外传》这样的，实际上是晋以后的文人方士，托名汉人写作的传世小说，逐一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当中，除了“神仙家言”，就是“方士窃虑失志，借以震眩流俗，且自解嘲之作”，就是说，这些小说，大体上也还都与神仙道术有关。进一步，鲁迅又指出，像传为曹丕作的《列异传》、干宝所作《搜神记》与刘敬叔所作《异苑》，等等，都属于典型的记录神祇灵异、人物变化的志怪小说。

鲁迅在这里，于是写下一段以后被人常常引用的结论性的文字：

>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两晋南北朝以迄隋代的志怪小说，之所以大都“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在鲁迅看来，是与自战国以来，方士们的宣扬神仙巫术不无关系的，也与后来佛教的，每每“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的宣传，大有关联。在稍后，鲁迅为他自己编纂的《古小说钩沉》撰写的《序》里边，他仍然用了“大共琐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物，数术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验冥征，释氏之下乘”这样一段话，来概括他所辑录，

上自《青史子》，下至《旌异记》的，三十六种古小说的内容及其特征，这里面提到的“真人福地”和“幽验冥征”，指的正是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的道教与佛教元素。

比鲁迅略早一点，日本的盐谷温在他 1919 年出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译本题作《中国文学概论》)第六章“小说”里面，就已经谈到过中国的古代神话，多出自道家、杂家的问题。盐谷温认为，汉代小说，乃以汉武帝时为最发达的时期，由于武帝好色而又信神仙，小说中因而往往出现“神仙谈”与“宫闱情话”。到了六朝，小说仍然出入于神仙道术，不过因为佛教势力逐渐抬头，其中便有了一些神怪荒诞、轮回因果的表现，“与汉代小说渐异其趣”。盐谷温的这部书，尽管迟至 1926 年，才有了由朴社出版的陈彬龢的第一个中文译本，然而，鲁迅自己也说过，他在作小说史讲义的时候，已经看到此书，某些思路受它启发，抑或与之相呼应，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其实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凡与道教相关的研究，也确乎很少不受到日本的影响。在傅勤家 1934 年出版的《中国道教史》里，所述“外人”有关道教史的论述，就全部见于日本人的论著，包括已经有了中文译本的小柳司气太的《道教概说》、妻木直良的《道教之研究》和常盘大定的《道教发达史概说》。而如葛兆光在《中国大陆宗教史研究的百年回顾》(收入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中所说，1920 至 1940 年代中国学界的道教研究，如在许地山、傅勤家、陈垣、陈国符等人的著作表现出来的，几乎是无一不

受到日本学术思想的影响。

1927年,也是旅居东京的滕固,在郑振铎主持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世人的苦闷与游仙文学》的文章。文章主要讲的是,在魏晋六朝人的诗歌中,随处可见"渴慕老庄的精神",当时的不少作品,都可以说是"以神仙传说为材料"的、使老庄思想得以具体化的游仙文学。游仙文学,既然表现的是老庄思想,那么,它就跟以老庄思想为主体的道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滕固看来,道家也是和基督教、佛教一样的,道家的"仙界",便如同基督教的"天国"与佛教的"极乐国土",所以,游仙文学所表现的,也就是同基督教文学一样的,是所谓"美之漂渺的世界"。而在魏晋六朝的游仙文学中,陆机的《前缓声歌》、鲍照的《升天行》、何劭以及郭璞的《游仙诗》,等等,都是代表性的作品,它们都有着对神仙的企慕和对长生术的信仰,也都与庄子、屈原的泛神思想相通。

就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面,并没有直接提到道教,还只是在说着道家、方士什么的,还只是在讨论巫术、神仙说跟小说的关系什么的,在滕固的这篇文章当中,"游仙诗"的思想来源,也才仅仅追溯到庄子和屈原那里。

但是,到了1934年,许地山出版他的《道教史》(上册)时,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的神仙思想及游仙情节,是怎样与道教发生关系的,发生这种关系的原因和脉络,就被梳理和分析得比较清楚了。

许地山指出,"神仙说"是从道家的养生理论发展而来

的，这一派的倡导者中，原来也有一类可以称之为“骚人”的，但骚人也好、神仙说也好，还都仅仅是与道家有缘，与道教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直接发生关系，无论如何要到“汉末张道陵之徒采神仙家底信仰以立道教”之后，而到了魏晋以后，“神仙底寻求乃成为道士所专底事业”。道家和道教这个界线，在许地山这里被界划得很清楚，尽管它们表面上，有某种很一致的地方，可是，在东汉末张道陵创天师道以前，无论是那些洋溢着老庄精神的游仙诗，还是那些充满奇幻变化的神仙小说，按照许地山的意思，是都不可能与道教发生任何联系的，因为真正的道教文学，或是与道教有关的文学，一定是要产生在作为宗教的道教成立之后的。

稍后，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又将道教与道家、道教与巫觋、道教与方士的关系，阐释得更加明白。尽管他也认为，道教不等于道家，可他同时也看到，首先道教的义理，还是本之于道家的；其次，那些道教的信仰者，也是“由古之巫祝而来，展转而为秦汉之方士，又演变而成今之道士”，巫祝、方士、道士，这三种身份，本可以相互重叠。因此，道家和道教，既是两样的，又是相关的。

由于道教是一种中国的本土宗教，它的来源和成分颇为复杂，它的边界和形式也难以确定，要讨论它与同时代文学的关系，事实上，是有难度的，很难说清楚表现在同时代文学里面的，究竟是道教，抑或是来自其他方面的思想。所以，真正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与道教关系的研究，也还等到像许地山、傅勤家这样的宗教学者，来澄清作为宗教的道教，它和

道家、它和方术等等，究竟有着什么样复杂的关系之后。

所以直到1948年，王瑶写他的《小说与方术》一文，仍然还在小心翼翼地清理这中间的纠葛，在表述方面，也句句斟酌。王瑶一面接受了鲁迅关于小说起于方士的成说，坚持以为“汉人所谓小说家者，即指的是方士之言”，而“汉魏六朝对于小说的观念和小说的内容，都和这起源有关系”；一面也就方士与道教的关系，作一些补充说明，以解释小说与道教之间的联系，究竟是怎样建立的。他说，方士是从巫医那儿来的，因而他们能预知吉凶、医疗疾病，也通晓地理博物之学，掌握有通鬼神的技术，所谓巫医之术，也就是方术。方术的发展，到后来变成了道教，所以，道教的道术和企图，也跟方士一样，所以，道教也讲神仙鬼道。

当然，能够真正地将文学放置在道教的背景之下，或者说涉及到道教文学的，还是陈寅恪的，收在《金明馆丛稿初编》里的一系列关于中古道教的研究论文。

1933年，陈寅恪发表了这一系列论文中的第一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这篇文章的重点，本来在于勾勒汉末东西晋南北朝的政治演化，与天师道之关系的线索，同时，说明天师道的神仙学说及信仰，是否经由海上交通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不过，在分析天师道信仰者所受环境之薰习及家世之遗传的过程中，陈寅恪也指出了，像收养过谢灵运的钱塘杜氏，还有出过王羲之的琅琊王氏、出过孔稚圭的会稽孔氏、出过葛洪的丹阳葛氏、出过沈约的吴兴沈氏，等等，都是世代供奉天师道的

事实。这就提醒人注意到，在谢灵运、王羲之、葛洪、沈约这批东晋南朝文士身上的道教背景。

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当日多数世家，是“行事遵周孔之名教，言论演老庄之自然”的，但他们“安身立命之秘，遗家训子之传，实为惑世诬民之鬼道”。文章除了证明东晋南朝的大多宫廷剧变，原来都出自天师道的阴谋，这一政治史上的大关节，又还揭示了道教在当时文化艺术方面造成的影响，比如信奉天师道的人，大可不避六朝一般人最重视的家讳，父子兄弟，往往都能取“道”、“之”这类代表宗教信仰的字为名；又比如，因为天师道极其称赏竹子的功用，因此，世传王猷之就特别喜欢竹子；再比如，天师道写经画符，都用得着书法，所以，像南朝的琅邪王氏和高平郗氏，还有北朝的清河崔氏等奉道之家，同时也都是善书之家。

1941 年，陈寅恪再写下一篇《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文章。

这篇文章，从民族、地域的角度，来论述南朝的政治史和社会史。在文章中，陈寅恪除了提到编撰《后汉书》的范晔，是出自世奉天师道的家族这一点之外，更推论杂居武陵、长沙、庐江一带的南蛮溪族，也就是天师道的信徒，而江左名人陶侃及陶渊明恰是溪族人，所以，《桃花源记》开篇所写“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就透露出它应该是一篇有关溪族的纪实文字。文章还说，陶侃的后裔，取名多遵从天师道的习惯，有像绰之、袭之、谦之这样的名字，又有像袭之、谦之父子，取名当中都有个“之”字，也并不忌讳，懂得这一点，对于了解陶

渊明的思想以及他的宗教倾向,应该大有帮助,可以知道,为什么“生值晋宋之际佛教最盛时代,大思想家如释慧远,大文学家如谢灵运,莫不归命释迦,倾心鹫岭,而五柳先生时代地域俱与之连接,转若绝无闻见者”?

而在翌年发表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的论文中,陈寅恪又进一步把陶渊明的思想与宗教倾向,放置到由清谈内容的变化展现出来的,魏晋思想史之流变的大背景下加以讨论。

在陈寅恪看来,当魏末西晋之际,清谈的内容,还是以对时事政治的关心与个人立场的表达为主的;可是到了东晋,清谈就失去了它的政治内涵,演变成为名士口头的或纸上的玄言;及至佛教传来,由于思想界沉寂已久,士大夫对这一新的学说,自然表现出纷纷惊服、欢迎的态度,由此而“开震旦思想史从来未有之胜境”。然而,就在这样一个佛教盛行的时代,何以陶渊明独独不受佛教的影响?他问。这一问,再度引出来陶渊明世代信奉天师道的家族背景。根据陈寅恪的分析:

> 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

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

在以上论文中，陈寅恪充分利用了比如《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道经"之部与陶弘景《真诰》等等的道教文献，对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史做了新的解读，并特别强调其中的家族和宗教两个元素。这一系列解读，既涉及到对于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宗教信仰、精神世界以及艺术创造的理解，也涉及到对于这一时期道教与文学关系的认知，就像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这篇论文的一开头，他所交代的："古今论陶渊明之文学者甚众，论其思想者较少。至于魏晋两朝清谈内容之演变与陶氏族类及家传之信仰两点以立论者，则浅陋寡闻如寅恪，尚未之见，故兹所论即据此二端以为说，或者可略补前人之所未备欤？"

由后来的影响来看，陈寅恪的这些论文，实际上，不但可以弥补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也可以弥补文学史研究，由于视角单一和文献窄化而表现出来的种种不足。

直接或间接受到陈寅恪的启发，而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中，引入道教的，比如有王运熙的《神弦歌考》(收入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一文。这篇文章，就是利用了《云笈七签》、《魏书·释老志》等与道教相关的文献，来考察乐府清商曲中的神弦歌，针对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江南杂鬼怪。比起萧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第五编《南朝乐府》中，对"神弦歌"所祀之神的考证，还只是利用了《图书集成》所收《神异

典》及部分正史的材料，成绩明显提高。

在《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所附《读莺莺传》这一篇里，陈寅恪还曾经写有这么一段话：

> 太平广记四八八杂传记类载有元稹莺莺传，即世称为会真记也。会真记之名由于传中张生所赋及元稹所续之会真诗。其实“会真”一名词，亦当时习用之语……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天下篇语。）后来因有真诰真经诸名。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绿华之世缘，流传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妓者。

从《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联想到道教上去，以为“真”与“仙”同义，“会真”就是遇仙、游仙的意思；又从《莺莺传》流传的唐代，向上回溯，以为会真亦即遇仙、游仙的传说，而这在六朝以来，早已为一种固定类型。陈寅恪的这一解读，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研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二三十年，有不少学者就从道教和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六朝时的“神婚”传说，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比如李丰楙在《魏晋神女传说与道教神女降真传说》（收入李丰楙《误入与谪仙》）的文章中，就一面通过对如《搜神记》里的成公知琼、杜兰香与《后搜神记》里的何参军女等故事的分析，一面通过对《真诰》等道教文献所记载降真仪式的讨论，对陈寅恪所提出，以“会真”为题材的作

品，都与道教有关的这样一个话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他指出：

> 神女传说在民间文学中，由于其奇幻生动的情节、美貌多情的神女，在命定情缘的思想架构中，可以满足其情欲的虚幻感，解说男女关系的命运观，自是具有其吸引力，因此影响深远而成为民间文学类型学中的一类。而一般文人则对凡男和神女之间的浪漫情愫，特多好感，一再取作典故，拈为诗题，借以隐喻其现实生活中不便明说的两性关系，故显现缠绵悱恻，凄艳动人。而道教中人秘传房中秘诀者固仍有之，但在纯净化的道教修发中，显然已逐渐超越此种二景修法，不愿保存神女所表现的暧昧清热，而将她们一一改塑为谪降或具有导引者身份的仙真，其中反映出道教中人重新创作新神话传说的作业……

可以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魏晋南北朝文学与道教之关系的这个领域，会有越来越多的成果出现。不过也需要看到，由于道教以及道教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也会令道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未来变得越来越困难。事实上，在这个领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实际上有所推进的，也只是与小说、游仙诗有关的这两个话题，而未能就道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联系，作多方位的考察。

举例来说，比如陈寅恪曾经讨论过的道教与书法的关系，在他之后，便不大有人借鉴这一思路，去注意道教的仪

式，会不会与文学有关，也很少有人像研究佛教给文学语言、文学文体、文学的想象力带来的刺激那样，去探究道教在文学语言、文体和想象力方面造成的影响。甚至是，陈寅恪对陶渊明所做“外儒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道”的分析本身，就受到过不少批评。朱光潜在他 1946 年发表的《陶渊明》(收入朱光潜《诗论》)的文章中，便反驳陈寅恪的意见，认为他是硬要把陶渊明说成为“有意地建立或皈依一个系统井然壁垒森严底哲学或宗教思想，像一个谨守绳墨的教徒”，而这是对陶渊明思想和性格的歪曲。朱光潜更愿意相信，诗不是从思想而是从情感中来的，所以他说，尽管陶渊明和我们一般人一样，内心里有许多矛盾和冲突，但“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

即便并不是从意识形态的的角度，也不是从唯心、唯物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做判断，似乎也有相当多的文学史研究者，都像朱光潜一样，不大容易接受这样的事实，就是说文学，也会受到道教这一中国本土宗教的深刻影响。



6

从替玄学平反到魏晋风度论

鲁迅写过一篇《吃教》的杂文，里面说道：

> 其实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

这一段话，历来被认为是对魏晋南北朝精神史的一个相当经典的概括。认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不能撇开佛教、道教，当然最不能忽略的，还是儒家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儒家的思想。所谓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便是掺入了老庄哲学的玄学。

对玄学的阐扬，在近代，至少也要追溯到刘师培 1905 年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国学发微》一文。在这篇长文中，刘师培指出，正始年间的老庄玄学，实际上是随着东汉末年诸

子学的复兴,而兴盛起来的:

> 东汉末年,诸子之术朋兴,治儒家者有徐幹,治阴阳家者有管辂,治医家者有华佗,治兵家者有魏武(注孙子、吴子)、诸葛亮(作八阵图)、王昶(注兵书),然以法家学术为最昌。自王符、崔寔、阮武、姚信之徒以法家辅儒学,而魏武治邦,喜览申韩法术,以陈群、钟繇为辅弼,诸葛亮治蜀,亦尚刑名。盖汉末之时,纲纪废弛,浸成积弱之俗,欲矫其弊,不得不尚严明;又以处士议政,国柄下移,民气渐伸,为人君所不利,非修申韩之术,不足尊君而抑臣。有此二因,遂宗法学。观杜恕上疏,谓:"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魏代学术,观此可知,是犹东周衰弱,而管、商以法律矫之也。
>
> 至于正始,而老庄之术复昌。(引自邬国义、吴修义编校《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

刘师培把玄学兴盛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是在三国以来统治者的严刑峻法之下,人民得不到安宁,王弼"嫉其苛",因此提出老庄清静无为的主张,希望人民能够借以休息养生。"非崇尚无为清净不足以安民",这可以说是老庄玄学之所产生的现实的政治背景。第二,是此前流行的法家思想以及政策,本来已经导致了传统礼法和传统道德的崩坏,就是说,"法家严贼寡恩,漓于天性,已开放弃礼法之先",这也可以说是老庄玄学产生的思想基础。第三,是由于"魏晋

之际，战争频烦，民罹屠毒，无乐生之心，故或托任达以全生，或托隐沦以避世”，这种动荡不安的生存环境，最容易逼迫人选择任意放达、逍遥自在的生存方式，以此来保全个体的生命，这也可以说是老庄玄学产生的心理基础。

“一代学术，必有起原”，上述从历史的角度所做分析，多少是怀了对正始玄学的了解之同情，而非简单地把它跟礼崩乐坏、跟亡国亡天下捆绑在一起，然后给以严厉的道德批判。这种做法，跟正始以后的评述者，“莫不祖述范宁之论，以王(弼)、何(晏)为罪人”的立场和目的截然不同。在刘师培的心目中，玄学风潮固然要负起“置治乱兴亡于度外，诚为覆都亡国之基”的责任，然而，单纯地从学术立场判断，玄学家不以象数言理、不以阴阳断人事，他们“析理精微”，成就远在迂阔的汉儒之上。

像刘师培一样，章太炎也是对魏晋南北朝特别有好感的一个人。他崇尚老庄，曾说孔子的精华，是从老子那儿来的，庄子则兼具儒佛之长。他在《国学论衡・论式》里还讲过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盛世，一个是在晚周，一个就在魏晋。他因为自己卷入政治很深，好写政论文章，又讲究政论文要能够“持理议礼”，所以，也偏爱“不牵章句”的钟会、傅玄、王弼和裴頠等人的议论文，常说现代写文章的人，最好能够“以魏晋为法”来养成学力。又因为好佛教，而喜欢谈玄的文字，尤其是王弼、阮籍、嵇康和裴頠这一等人的文字，所以，他也力挺这样的魏晋文章。

除了称许魏晋的思想和文章，如同刘师培一样，章太炎

还盛赞玄学的讲究思辨，说是可以借以锻炼人的思维，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艺术乃至于医学的发达，就恰好是由于有这一条。因“凡为玄学，必要之以名、格之以分，而六艺方技者，亦要之以名、格之以分，治算、审形、度声则然矣。服有衰次，刑有加减，《传》曰：‘刑名从商，文名从礼。’故玄学常与礼律相扶。自唐以降，玄学绝，六艺方技亦衰。中唐以降，斯风绝矣。宋元意言性，惟算术亦巧善，今益以礼、医与律，犹弗逮兼”（《五朝学》）。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说玄学的思维方式，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因此之故，玄学不但有益于数学、物理、音乐和医学这一类学科的发展，也有利于建立道德与法律的社会秩序。

总之，魏晋时代是一个思想、文化乃至于科学技术，都得到极大发展的时代，玄学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积极、正面的角色。

刘师培、章太炎不仅为魏晋南北朝的玄学翻了案，同时也为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翻了案，而这也就是章太炎的门生、且对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颇有好感的鲁迅，在做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的演讲时，他之所谓“魏晋风度”、他的立论的基本来源。

在 1927 年面向广州市民的这篇讲演中，鲁迅从一开始，就连续不断地向过去的历史记载和论断提出质疑。他说：曹操不是《三国志演义》和戏台上的花面奸臣，却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一个英雄；正始名士何晏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利；嵇康、阮籍这一拨名士

被戴上毁坏礼教的罪名，也是受了很大冤枉，因为这些人实际上“倒是承认礼教”的，并且“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

演讲还提到曹魏的尚刑名、尚通脱，思想通脱以后，鲁迅以为，“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他说，曹操写文章，就从通脱得力不少，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曹丕也是主张诗赋不必寓教训的，所以，“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就是何晏、王弼，虽为服药的祖师，却也都有文章流传；嵇康、阮籍纵酒，可也能作大文。后人因为不了解他们的内心，无端地学他们空谈、饮酒、服药，所学无非皮毛，弄得毫无实际，在文学上，则是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都没有了，直至东晋末年，才出了一个“田园诗人”陶渊明。当然，完全超于政治的诗人也是没有的，“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反礼教的行为，在鲁迅看来，就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反抗。以此来分析自孔融、正始名士、竹林七贤和陶渊明这样一些魏晋文学家的思想及其作品，对历来被视为不仅在道德上有瑕疵、更负有亡国之罪责的这班文士，鲁迅的言谈之间，便充满了温情和敬意。他以为，在这些人看似激烈的种种荒诞行为的背后，其实都掩藏着深刻的政治和思想动机，也正是由于这些异端之士个个别有政治理想和怀抱，当这种理想和怀抱被压抑得不能实现的时候，才让他们写作出了或慷慨悲凉或自然飘逸的诗文作品，因此，这个时代，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比起刘师培和章太炎的翻案文章，鲁迅关于“魏晋风度”的这篇演讲，更清晰地透露出，他在评价魏晋文学史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魏晋思想史的时候，是以“思想解放”和“文学独立”这两个近代观念，作为衡量文学与思想之进步的指标的。

由刘师培、章太炎所描述的魏晋思想史及文学史的演化过程，经过这一近代概念的表述，变得更加容易被理解、被接受。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鲁迅的这一篇本来只是针对公众的讲演辞，经过整理发表，在学术界，竟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

比如关于嵇康，在鲁迅之前，一般的评论，大体上都停留在像陈延杰的《魏晋诗研究》所描述的，那种所谓“一餐霞人，又好老庄之业，乃不偶世，遂弹琴咏诗，心颇自足”的层面，而并没有从嵇康跟现实政治相对抗的角度，做很深入的研究，但是，自从有了鲁迅的“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的论断，后来的人，好比等到陆侃如和冯沅君写他们的《中国诗史》的时候，就自觉不自觉地追随着鲁迅式的体验和分析，将包括嵇康在内的魏晋文士，说成是“转向药和酒里寻安慰”，他们中，尽管有人沉迷于此，“但第一流的才人却知道药和酒不过是避免无谓的牺牲的工具，热烈的内心是始终保持的”，其中阮籍的《咏怀》诗，就是“这种内心的外泄”。

当刘大杰 1939 年写作他的《魏晋思想史》，对于魏晋人的充满“热烈的个人的浪漫主义精神”、“无论对于宇宙、政治、人生或是艺术，都持有大胆的独立的见解”、也都能在酒色药石音乐山水宗教中找到灵魂的寄托，就一直赞不绝口。

这部名为“思想史”的著作，有一章，还特别题作“魏晋时代的文艺思潮”，其中，从文学理论的形成，谈到文学的独立，从糅和了老庄的无为遁世、道教的神仙和佛教的厌世思想的《山海经》、《穆天子传》、《高士传》以及游仙诗等描写玄虚世界的作品，谈到个人主义的浪漫文学，又从顾恺之的画，谈到魏晋艺术渐渐脱离汉代的装饰的实用性，而“走向独立的艺术的地位”。这一章的内容，自然远远超出了鲁迅那一篇演讲涉猎的范围，可是它的基调，却依然为鲁迅式的：当新兴的思想家们针对儒家和儒学，或加以幽默的嘲笑、或给以正面的攻击、或以种种破坏礼法的放浪行动扫其面子的时候，“文学也就乘着这个解放自由的好机会，同儒学宣告独立了”，而曹丕，正是发动这个“文学独立运动”的人。

1940 年代，王瑶在清华大学讲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的汉魏六朝一段，讲稿编成《中古文学史论(集)》一书出版，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又一版再版。该书中的《玄学与清谈》、《文人与酒》、《文人与药》等章节，如作者自己所说，也如标题所示，都“深深受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重版题记”)。比如其中说，王弼、何晏这一班正始名士，“皆世家子弟”，“虽尊崇老子，却并不菲薄孔子”；阮籍、嵇康这一班竹林名士，虽任诞放达，思想行为更趋于极端，却也“有忧患的背景，并非故意如此”(《玄学与清谈》)。比如其中又说，魏晋名士中的饮酒派，“是以日常行为来表示他们的旷达和自然”，服药派，“则正是清谈的祖师，有他们一定的‘论

题'"(《文人与药》)。诸如此类的分析,显而易见地就是在鲁迅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阐发、进一步的引申,所以,尽管比起鲁迅的演讲,王瑶在每一个章节都补充了大量的资料、增加了大量的细节,可是这些资料起到的作用,不过是使整个论述过程,显得更加绵密、周到,从而使结论更加完善,也更具说服力罢了。

文学的独立与玄学的兴起,在解除汉代儒学的束缚、追求思想上的自由解放这一点上,恰相遇合,这使魏晋文学不但有章太炎和刘师培所说艳逸壮丽、长于析理的特点,也有玄远自然、超凡脱俗的境界。

而由1940年前后写作《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辨》的汤用彤来看,玄学的特点,正在于它忽略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即所谓"宅心玄远",亦所谓"重神理而遗形骸"。因为玄学的影响,魏晋士大夫不但心胸高远、行径超脱,有得意忘形骸的人生观,"读书须视玄理之所在,不必拘于文字。行事当求风神之萧朗,不必泥于行迹",就是当时的人物画,也受到这种风尚的影响,顾恺之感慨"画人最难"、"数年不点目精",就都是说的传神最难,而形体无足轻重。魏晋文学的崇尚隽永、隐秀,也同这一波风气有关。

在现存《魏晋文学与思想》(收入《汤用彤全集》第四卷)的讲义中,还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汤用彤对魏晋时期人物画风格、山水诗兴起的更明白的解释,他称魏晋人的出世之道,

为一种人格的、内心的变换，所以，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神虽世表，终日域中”式的，是“身在庙堂之上，心无异在山林之中”式的。而有如此的心胸本领，汤用彤说，便既能够发为文章，如陆机所说“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音”，又能够发为神品的绘画，人物画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专重神气”，就是这个缘故，因“传神”，才能接近生命的本体，表达出自然之美和造化之美。因此，当时品藻人物，最常用到“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王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之类关乎山水的字眼，似乎是要超越人的形象的具体描写，直探生命的本源。到后来，就产生了专门的山水画法，这便是用山水画来直接表现造化自然，于是，“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用来表达造化自然与生命本源的“山水”这一媒介，就这样，不但出现在绘画，也出现在诗歌当中。

汤用彤的解释，更注意到玄学思想内在的变化，而这种思路，也表现在宗白华写于同一时期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1940 年)的文章中。宗白华在这篇讨论魏晋美学的文章中，把汉末魏晋六朝称作“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简约玄澹、超然绝俗，是这个时代的美的特征，它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在山水画和山水诗中，这样一种美的特征，表现得尤其明显。在 1979 年发表的《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收入《美学散步》)一文里，宗白华仍然延续这个看法，把魏晋六朝看成是“中国美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因为这时有一种新的美学理想出现，便是

把“初发芙蓉”，当作比“错金镂采”更高的境界。他说，陶潜的诗、顾恺之的画和王羲之的书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力求表现自己的思想和人格，而不去追求文字的雕琢、整齐和装饰性。

在此后的岁月，无论意识形态怎样变化，对与玄学相关的魏晋文学的评价，几乎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在1980年代出版的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还是能够看到“人(我)的自觉成为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作本体建构，正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这样的，自刘师培、章太炎以来，以至于鲁迅、汤用彤式的论述；而其中说魏晋是“重情”与“寡情”的思辨哲学携手同行的时代，此乃由于魏晋玄学追求的，是一种“富有情感独立自足、绝对自由和无限超越的人格本体”，这样一种悖论式的分析，说到底，和鲁迅说阮籍等人毁坏礼教，恰是固执地相信礼教所致，也是同一不变的逻辑。他在《美的历程》中，干脆以“魏晋风度”和“佛陀世容”为题，来概括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文化史，以为魏晋是人的觉醒、五彩缤纷人格呈现的时期，也是文的自觉亦即文学、绘画和书法等艺术创造出“华丽好看”、“气韵生动”的形式的时期，而大量流传至今的佛像雕塑，则反映出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贵族，在接受佛教过程中形成的审美理想：病态的瘦削身体、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和摆脱世俗的潇洒风度。

7

附　　录

基本阅读书目

中国中古文学史

刘师培著，北京大学出版部 1920 年初版；舒芜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

1918 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为本科二年级开中古文学史的课，同时编写了这部讲义，他去世后，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讲义共分五课：一概论，二文学辨体，三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四魏晋文学之变迁，五宋齐梁陈文学概略。

由于讲者秉持“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的观念，因此首先，他把讲究对偶和声律视为中古文学的主要特征；其次，他也把中古文学看成是中国

文学史的高峰,认为“中国文学,至两汉魏晋而大盛”,宋齐梁陈,承其绪余,而唐宋以下,才是“文学陵迟”。

该讲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它非常注意各个朝代文学的承继和变化关系。比如,它在揭示了曹魏之于汉代文学的变化之后,进一步论述变化的四点原因:(1)为曹操提倡刑名之学带来清峻的文风;(2)为建安时期不尚礼法而尚通脱带来侈陈哀乐、渐染玄思的作文风气;(3)为汉末以来四方割据,士人仰慕古代纵横家而带来新一轮的骋辞之风;(4)为汉灵帝倡导的俳词在魏初依然受到重视。又比如,它指出类似于名家、法家的何晏、王弼与接近纵横家的嵇康、阮籍的文章,都可以在建安时代的孔融、王粲、阮瑀、陈琳身上找到远源。再比如,它称宋齐梁陈的文学家大抵出于世族,因此好用典、为宫体、善论理、喜谐隐,而这些习惯,或在晋代已经初见端倪。最后,它说明南朝文学之所以能够上变晋宋、下启隋唐,发明声律说以及区别文笔是两大重要原因。

这部讲义受到过鲁迅的称赞,可以说是近代以来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著,北京大学新潮社 1923 年出版上卷、1924 年出版下卷;上海,北新书局 1925 年初版,1935 年第 10 版。

1920—1926 年,鲁迅先在北京大学、后来也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小说史的课,讲义起初由北京大学排印,1923 年底并翌年中,新潮社根据北大的排印本分上、下两卷正式出版

为《中国小说史略》,1925 年北新书局始将它合为一集。1935 年,该书印出经作者修订过的第 10 版,此后的各种版本,大都依照这一版排印。

该书所叙说虽为先秦至清末的小说通史,但其中至少有四篇涉及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它们分别是: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书中考订小说作者、年代、真伪及版本流传的情况,同时分析小说与神仙方术、佛教道教的关系,其中如"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等论断,都已成为小说史研究方面的经典。

陶　渊　明

梁启超著,北京,朴社 1924 年初版;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 96》,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该书是 1923 年冬天,作者在家养病,"读陶集自娱"时写成的,由"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陶渊明年谱"与"陶集考证"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从时代心理和作者个性入手,分析陶诗中的爱自然、爱自由的精神,第二部分考订陶渊明生平,以为他非如《宋书》所说卒于六十三岁而是五十六岁,第三部分是对陶渊明作品的考证。

该书出版后,曾引起不少讨论。

中古文学概论(上)

徐嘉瑞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4月初版。

这是受到“五四”新文学思潮影响、较早套用“贵族”与“平民”这一组概念叙说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的一部著作。全书共分五编:第一编绪论,包括“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平民化之文学、音乐与文学、中国音乐与西域文化之关系、诗与散文”等五章;第二编平民文学,包括“汉魏平民文学、鼓吹曲及横吹曲、相和歌辞、六朝平民文学”等四章;第三编舞曲,包括“舞之发生之心理的关系、舞之发生之历史的关系、中国舞曲、外国舞曲”等四章;第四编贵族文学,包括“汉代贵族文学、魏晋贵族文学、南北朝贵族文学”等三章;第五编唐代平民化之文学,包括“唐代文学之背景、唐代文学之分类”等二章。

本书的另一特色,还在于它是以音乐为标准来区分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它认定贵族文学都不协律,只有平民文学才能被歌唱,由此,文学史便与音乐史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而中古文学的时代也被称作乐府的时代。

胡适1923年9月为该书作序,称赞它“是一部开先路的书”,因为书中反映了文学史的从平民文学到正统文学的发展过程,可以使人得出“正统文学也往往是从草野田间爬上来的”之结论。

汉魏乐府风笺

黄节著,北京大学出版组 1924 年初版;陈伯君校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

该书完成于 1923 年作者任教于北京大学时期,十五卷,选录属于相和歌辞与杂曲歌辞的汉魏乐府诗一百五十六首加以注释。作者以为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即相当于先秦时的从各地采风,乐府诗就等于《诗经》里的"风",所以,其书名也取《毛诗序》"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的意思。

作者曾说自己是在现代大学里讲解乐府诗的第一人,他的解说方式却颇类清人:先在每一曲辞下面,写解题,然后在每一首诗下面,引旧注而后择别之,或加音释,最后是汇集众家评论。不过这种系统的笺释,对于后来的研究者解读乐府诗,却是有很大帮助的。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梁启超著,上海,中华书局单行本 1936 年初版;收入《饮冰室合集 · 专集 74》,中华书局影印本。

该书作于 1924 年,是一部未完成的遗稿。现存书稿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为:第一章秦以前之歌谣及其真伪,第二章两汉歌谣,第三章汉魏乐府。其中,第三章列有自《汉书 · 礼乐志》起、讫于梅鼎祚《古乐苑》的有关乐府歌辞的书目,逐一解说,并且详细考订乐府的范围。后一部分为题作"周秦时

代之美文"、"汉魏时代之美文"的两篇未完稿，前一篇只讲了《诗经》，后一篇也只有"建安以前的汉诗"这一章，但由汉武帝前后四言诗皆模仿三百篇而无创造性这一点，牵扯出了"五言诗(即苏、李、枚、卓诗)发生"时代的问题，在这一篇，还有对《古诗十九首》"厌世思想之浓厚——现世享乐主义之讴歌"的思想内容的分析。

从《古歌谣及乐府·序论》"以汉乐府为中坚，而上溯古歌谣以穷其源，下附南北朝短调杂曲以竟其委，魏晋以后用乐府调名标题诸作，则各以归诸其时代之诗，不复在此论列"的叙述来看，作者本来的计划，就是要写一部乐府文学史。之所以上溯到古歌谣，是由于作者认为歌谣乃最早的韵文，乐府是后来的专门音乐家"取古代或现代有名的歌谣按制成谱"并据以写出的"合乐之歌"，就是说，歌谣和乐府有一种渊源关系。作者还认为，乐府自西汉中叶兴起，至东汉末年消沉，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汉代以后多为模仿之作，价值不高；南北朝时的仿汉乐府与五言诗已经没有多少分别，只在一种类似乐府的短歌谣里，尚可见出平民文学变迁的样貌。

作者显然是要把乐府当成平民文学加以整理和表彰的，但他也并不全然否定有着"人工美"的诗人之作，他在这里甚至也说"诗的命运比歌谣悠长，境土比歌谣广阔"。

乐府古辞考

陆侃如著，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6 年初版；收入《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这是一部从文献角度研究乐府诗的近代专著,在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乐府古辞"的范围。一方面,作者采用"五四"新文学的概念,把汉乐府分成民间歌谣和文人作品两类;另一方面,他又根据与音乐的关系来衡量,把乐府诗分成入乐的和不入乐的两类。作者以"古辞"来命名他的所谓"真乐府",强调只有合了"创制"、"入乐"这两条标准,才算是真乐府。在这一基本判断之下,他所以再度重申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里的看法,以为《乐府诗集》中的琴曲、近代曲、杂歌谣、新乐府都不得列入乐府古辞的范围。

该书有对乐府古辞的逐一解题,说本事,说存废,可以为乐府诗研究的参考。

文心雕龙札记

黄侃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2 年出版。

这是 1914 至 1919 年黄侃任教于北京大学,以《文心雕龙》授课期间,所作三十一篇札记,后来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书,也将札记印作讲章。札记的部分内容,还曾刊登在 1919—1926 年的《新中国》和《华国月刊》上。1927 年,北京文化学社首先将《神思》篇以下的二十篇札记出版,并附以骆鸿凯写的《物色》一篇的札记。1935 年黄侃去世后,南京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又发表了讲章中《原道》以下的十一篇。1947 年,四川大学中文系将以上两部分合印一册,内部发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将北京文化学

社刊印的二十篇札记与《文艺丛刊》所载十一篇札记汇合在一起整理出版的。

在《题辞及略例》中，作者称赞《文心雕龙》是一部文论经典，堪与史论之经典、刘知幾的《史通》媲美，他因此希望学生也能够通过《文心雕龙》来了解什么叫作“文”。

作者是章太炎的弟子，也拜刘师培为师，而刘师培上承阮元，所以，《札记》中时常引述阮元、章太炎的意见，并对桐城派加以批评，如《通变札记》就引用了钱大昕讽刺方苞“未喻古文之义法”的《与友人书》，借以抨击桐城派的“高谈宗派，垄断文林，据其私心以为文章之要止此，合之则是，不合则非”。

《札记》也相当注意引述前人如黄叔琳、孙诒让、李详等等的注释成果，同时辨证其谬误，对于阅读《文心雕龙》本身以及了解它的研究历史，有一定的作用。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著，《民国日报》1927 年 8 月连载，《北新》第 2 卷第 2 号发表，收入《而已集》，上海，北新书局 1928 年。

1927 年 7 月 23 日和 26 日，鲁迅应约为广州市教育局的夏期学术讲演会做了两个上午的演讲，记录稿最初发表在 8 月 11、12、13、15、16 日的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改定后发表于 1927 年 11 月的《北新》半月刊第 2 卷第 2 号，就是后来收入《而已集》的这篇文章。

文章里的很多论断，如称“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

觉时代'"、"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如说何晏"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嵇康阮籍等"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等等,都为后来研究魏晋文学及思想的人所尊奉。

白话文学史(上卷)

胡适著,上海,新月书店 1928 年初版;收入《胡适全集》第 11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本书的初稿,是 1927 年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的《国语文学史》,它是作者于 1921、1922 年为教育部主办的国语讲习所的课程编写的,由于此后"国内国外添了不少的文学史料",使作者有了一种"新出的证据不但使我格外明白唐代及唐以后的文学变迁大势,并且逼我重新研究唐以前的文学逐渐演变的线索"的感觉,所以借着重写的机会,他把原稿彻底修改了一遍。

准确地说,这是半部文学史,因只有第一编的"唐以前"和第二编的"唐朝(上)"。第一编"唐以前"实际也从汉代写起,并不包括汉代以前,所以这一部分,亦可看作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这一编共计十章,分别题为:古文是何时死的、白话文学的背景、汉朝的民歌、汉朝的散文、汉末魏晋的文学、故事诗的起来、南北新民族的文学、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

学趋势(300—600)、佛教的翻译文学(上、下)。

作者是"白话文学"的倡导者,为白话文学写史,自然是要替它争取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地位,但是本书最值得注意的,还不仅仅是它于古文的传统历史之外,清理出了另外一条白话文学之进化的历史线索,也不仅仅是它对所谓白话作品,往往能有新鲜独到的研究和品鉴,还在于:第一,它同时也相当关注白话文学与古文文学的相互依存关系,比如,它解释曹氏父子及其同时代文人仿效乐府的写作,说是从中可以见到一种文人"文学的民众化"趋势,因此"当时的文人如应璩兄弟几乎可以叫做白话诗人";又比如,它论及源起于汉代无名诗人的五言诗体,也说五言诗虽经阮籍所作《咏怀诗》八十首而抬高了地位,却是因此也增加了"文人化"的程度。第二,它特别用了两大章来讨论佛经的翻译,以为这种但求易晓、不加藻饰的翻译文学,对两晋南北朝流行的骈俪文体,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也对"那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却)有很大的解放作用",并且促成了后来中国小说、戏剧的发达。

汉魏六朝文学

陈钟凡著,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年初版。

本书是作者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时,应商务印书馆之约,为"百科小丛书"编写的一部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专著。作者是刘师培的学生,1914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曾做过《国故》月刊的编辑,此前刚刚出版过他的成名作《中国

文学批评史》。

该书说是汉魏六朝文学史,实际上只涉及到汉魏六朝的诗文。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两汉文学(前206—195),第三章建安文学(196—219),第四章魏晋文学(220—419),第五章南朝文学(420—588),第六章北朝文学(398—581)。

以"汉魏六朝"为文学史的叙说单位,据作者说,首先缘于苏轼"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文起八代之衰"的论述;其次,中国文学史上有过十一种文体,两汉到隋唐的中古时代,是辞赋、乐府、五言诗、骈文以及律诗的兴盛期,而汉魏晋南北朝正值其枢纽,即以诗赋上承周楚、以诗文下启隋唐,就是说,从文体的角度观察,"汉魏六朝"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重要的段落。

书中采用了贵族与平民两分的流行的文学观念,比如它把汉代乐府中的郊庙歌等视为贵族文学,而把相和歌当作民间文学,又比如它说建安文学的背景之一,是平民文学的复兴,当然他说的"平民文学",在这里,指的却是秦嘉、蔡邕等桓灵以后作家所写新诗体。此外,书中也或以写景、记事、抒情的概念,来分类和欣赏乐府诗,也或从用字、造句、立意、音节的角度,来解析和评价五言诗,于作品的阅读与诠释,不乏新鲜、有益的见解,比如在谈到曹丕、曹植一系列描写服食求仙的作品时,作者就说"他们皆能将理想的仙境,表现于诗中。与郊祀歌中《帝临》、《惟泰元》诸歌写神祇多属于秘密的,不可使世人想像者不同。此由写诗而至于理想,诗人意

境之一大变迁也”,就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

杨筠如著,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年初版。

这是一部历史学著作,只在书中第六章论及“六朝门阀的影响”时,也谈到了门阀影响下的六朝学术,包括文学、艺术。作者以为玄学的昌盛、文学的发达,都和世族子弟的浮靡习气不无关系,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的进步,是以社会风气的浮华低迷为代价的,这颇可代表一般史家对六朝文学的评价。

乐府文学史

罗根泽著,北京,文化学社 1931 年初版;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年。

这是作者在河南开封的中山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时,所拟“文学史类编”计划中的一部分,作者坦承书中“采取他人说最多的,两汉则有先师梁任公先生的《美文史》里〈两汉乐府〉一章(未刻),唐代则有胡适之先生的《白话文学史》里〈八世纪的新乐府〉一章”。

该书所述乐府文学史,自汉武帝立乐府起,至中唐止。作者以为,汉代乐府重在讲社会问题,魏晋时由于战乱和佛教的传入,乐府中也表现出求仙、出世、颓丧的人生观,六朝乐府中的情歌最多,而在乐府文学的发展史上,建安又是一

个高峰时期。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陈寅恪著,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册,1933 年;收入陈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初版。

这是作者 1930—1940 年代撰写的有关中古史的重要论述之一,讨论天师道与东汉以下中古政治及社会的关系,论文所揭天师道世家,有些也是文学世家或书法世家,因此可以为文学史研究者参考。

《金明馆丛稿初编》除了这一篇论文,还收录有作者此后陆续发表的《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崔浩与寇谦之》、《支愍度学说考》、《桃花源记旁证》、《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书魏书萧衍传后》、《哀江南赋》、《四声三问》等文章,涉及到中古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以及语言文学史等广泛的领域,对于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产生于其中的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文化,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魏晋诗歌概论

郭伯恭著,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初版。

全书分六个章节,前有总论,后有结论,中间按时代分别论述建安、正始、太康和永嘉以后四个阶段的诗坛。

作者认为,魏晋时代是古体诗的一个鼎盛期,结束了两汉的古典主义,开出六朝的浪漫主义。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汤用彤著,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8 年初版;北京,中华书局 1955 年重印;收入《汤用彤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该书是作者根据十余年间辗转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佛教史的讲义,最后在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合大学编写完成,于 1938 年元旦在长沙付梓的。全书分汉代佛教和魏晋南北朝佛教两大部分,仅就魏晋南北朝部分而言,虽然重点仍在叙述佛教史,但也有不少章节涉及当时的文人和文学,是考察这一阶段佛教与文学关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参考书籍。

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

罗根泽编著,商务印书馆 1943 年重庆初版、1947 年上海初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该书为作者在重庆中央大学时所写,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系列还包括周秦两汉、隋唐及晚唐各一部。全书共分十一章:一文学概念,二文笔之辨,三文体类,四音律说上,五音律说下,六创作论,七鉴赏论,八论文专家之刘勰,九论诗专家之钟嵘,十北朝的文学论,十一佛经翻译论。

作者认为,魏晋六朝的文学观念,较之两汉,发生了从“载道”到“缘情”的重大变化,文学脱离政治、经学而独立;而文学本身高于一切的观念,应当是六朝文学蓬勃发展的一个原因。在这一基本判断之下,该书对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重要的评论家做了相当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其中特设“佛经翻译论”一章,一一陈述自东吴以来或直译或意译的不同翻译主张,对于完整地理解这一时代的文学批评状况很有意义。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萧涤非著,重庆,中华文化服务社 1944 年初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增订版。

该书是在作者 1933 年完成的清华研究院毕业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曾经修改,于 1944 年出版,1984 年经过再次修订重版。全书于“引言”和黄节 1933 年写的“论文审查报告”之后,共设六编:绪论、两汉乐府、魏乐府——附吴、晋乐府、南朝乐府、北朝乐府——附隋。论文指导老师黄节对它有逐编的评论,总的评价是:“统观成绩全部,皆能从乐府本身研究。知变迁,有史识;知体制,有文学;知事实,有辨别;知大义,有慨叹,此非容易之才。”

在作者看来,乐府是如班固所说“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颇能反映“时代政教之隆污,民族之兴替”的,因此,这部乐府文学史舍声求义,它的重点,主要在于考察乐府本事及其背

景,而不在于讨论乐府和音乐的关系。也因此,作者认为汉乐府采诗以观风俗,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它的成就也就最高,“足以追配《诗经》、《楚辞》鼎足二三”;魏晋以后逐渐增多的文人作品,只关心个人,越来越失去乐府的社会意义;到了南朝,乐府完全脱离政治与社会,最浪漫,却也最空虚。

作者还认为,一切诗体都源自乐府,三言、五言、杂言出于汉,七言出于魏,五、七言律绝出于南北朝,也就是说,“只有文人模拟乐府之体制,而无乐府反蹈袭文人”,这是研究乐府文学史的关键。

十四朝文学要略(上古至隋)

刘永济著,重庆,中华文化服务社 1945 年初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重印;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新版。

这是作者 1928 年在沈阳东北大学讲授文学史时写成的讲义,原计划是要编写一部《文学通史纲要》,但由于课程中断,写作计划也中断,因此只留下卷首《叙论》和卷一上古至秦、卷二汉至隋。讲义曾在《学衡》连载,1945 年更名为《十四朝文学要略》出版,1984 年的重印本,是根据作者自己的校订而增补校勘过的。

作者认为,可以称作“文学史”的,古代只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还相近似,史书里的《儒林传》《文苑传》往往“限于时地,局而弗通”,诗话、文谈也有“师友雅言,随手记录”、“条贯靡存”的缺点;近代以来的文学史虽

然模仿西方学制，却多“杂撮陈篇，补苴琐屑”甚或为“稗贩异国之作”，因此他的原意，是要写出一部能够帮助读者“知人论世”并且可为“教育普及之用”的文学史。知人论世，要靠传世文献，是以该书列有大量基本史料；普及教育，须知“人心自然之文，不外情理两端，文学固有之界，亦分虚实二境”，是以该书也不乏抒情文以感化性灵、明理文以增进知识之类的新的写作观念，只是他所谓“恢之以四纲，以统其纪，措之以经纬，以究其变”的文学理想，终究显得有些拘束了。

魏晋玄学论稿

汤用彤著，中华书局 1962 年初版；收入《汤用彤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该书为作者 1938 至 1947 年发表在各种报刊或油印散发过的文章的汇集，共计有《读〈人物志〉》、《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向郭之庄周与孔子》、《谢灵运〈辨宗论〉》等八篇，并有附录《魏晋思想的发展》一篇。作者在这些文章中，讨论魏晋思想史上的“新学”，亦即玄学在正始、元康、永嘉和东晋这四个不同阶段所呈现不同的发展倾向，是理解魏晋玄学以及中古思想史的最重要参考书籍。

中古文学史论(重排本)

王瑶著,上海,棠棣出版社 1951 年初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重刊。

该书收入作者的十四篇论文以及由若干笔记构成的附录,论文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讨论文学思想及其与社会思想的关系,二是阐述文人生活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三是论述重要作家和作品。

书中的论文大都写于 1942 年到 1948 年,这期间,作者完成了在清华大学的大学和研究生学业,留校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课程。1951 年,棠棣出版社将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相关论文和讲稿汇为《中古文学史论》,分三册,题作《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出版。1956 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古文学史论集》便是根据以上三册整理修订的,但删去不少文章,增加了《关于曹植》、《关于陶渊明》两篇;198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予以重印,又增加了《读书笔记十则》。1986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恢复重印 1951 年棠棣版的《中古文学史论》,却合三册为一集,1998 年的重排本在此基础上,另外更补充了一些短文和笔记。

称"中古",只不过沿用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的习惯叫法,但作者自述他研究中古文学的思路与方法,尤其他写《小说与方术》、《文人与药》、《文人与酒》、《隶事·声律·宫体》这一类关涉文人生活的论文,更多的是受了鲁迅《魏晋风

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及相关文章的启发。比如,他选择文人与药和酒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来讨论中古文学,就是因为当鲁迅指出了这一现象之后,他认为,需要进一步追索"为甚么在这时期会发生这个现象,以及它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怎样的联系"。当然,比起鲁迅的讲演,作者积聚了更多的资料,包括大量的乐府诗以及佛、道文献,也加入了更细密的分析,如将吃药饮酒的行为,提升到对生命的留恋与对死亡的恐惧这样一个所谓文学永恒主题的层面,而这样一来,有关文人与药、文人与酒的话题,就从感性变而为知性,变成了一个纯粹学院式的论述。

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

钱穆著,《新亚学报》5 卷 2 期,1963 年 8 月;收入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76 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这是作者有关魏晋南北朝研究的一篇重要论文。文章总论魏晋南北朝前后四百年,"学术尚有传统,人物尚有规仪,在文化大体系上,亦多创辟"。佛教而外,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文章以为,"史"与"诗"的成绩最值得重视。史部当中,"杂传一类,尤为当时人所特感兴趣",而人物传记和地理记又为大宗,显示出这个时代特别重视人物、也特别重视门第郡望的时代精神及观念。集部当中,"正式有纯文学观念之觉醒,则必俟建安始",作品中表现作者自身的日常生活及其内心情感,因此家家有集,而集部大兴。

至于为什么文化上会有创新,这就要由门第家学的背景上去讨论。自有门第,就有累世家学,魏晋以下的门第,大多一面谨守儒家旧传统,一面竞慕文学新风流,重文辞、尚清谈,自成一种风流。

上述观察的角度和论点,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研究者都很有启发的价值。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逯钦立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这是作者自1940年起,在明人冯惟讷所编《古诗纪》和近人丁福保所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的基础上,重新编定的一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歌总集,1947年完成最初的辑校,1961年至1964年再加整理,1983年,于作者去世十年后正式出版。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分别为先秦诗七卷、汉诗十二卷、魏诗(含蜀吴)十二卷、晋诗二十一卷、宋诗十二卷、齐诗七卷、梁诗三十卷、北魏诗四卷、北齐诗四卷、北周诗六卷、陈诗十卷、隋诗十卷。

该书在辑、校两方面都很有优点:第一是搜罗完备。以作者当时的条件,它的搜集范围不仅限于旧集,也包括了近世发现的汉简、敦煌文献以及留存海外的《文馆词林》等,是相当不容易的。第二是校勘精审。作者遍检唐宋以前相关书目,对大部分由明代人辑录的魏晋南北朝诗,都做了仔细的校定,解决其中真伪错乱的问题,并给假托仙道鬼神一类的诗,作了时代上的编次。它引诗写出处、异文注版本,还给

每位作者都写了小传,这些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作为大规模的资料书籍,尽管该总集有不少错漏,已经人指出,即以魏晋南北朝人的诗而论,许多也都见诸整理得更加完善的别集,但迄今为止,它依然不失为掌握魏晋南北朝诗歌全局的一部最重要的文献,配合以清代严可均校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 年),则能够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本状况。

作者抗战期间就学于西南联大,1941 年毕业后进入史语所,该总集便是这一时期,在罗庸和杨振声两位老师指导下完成的工作。同一时期,作者还写有《四声考》、《说文笔》、《洛神赋与闲情赋》等论文,后来一并收入吴云整理的作者遗著《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

李剑国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初版;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5 年修订本。

该书初版本系作者根据 1983 年完成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修订而成,自志怪小说最初的形成即神话传说叙说起,讫北朝隋代志怪小说。全书共八章,第四章以下分别为:魏晋南北朝志怪繁荣与进步的社会原因及此期志怪的时代蕴含,魏晋志怪小说,东晋其他志怪小说,南朝志怪小说,北朝隋代志怪小说,朝代不明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作者以为魏晋南北朝是志怪发展的鼎盛期,此时志怪纷出、题材广泛,作者众多、身份复杂,篇幅也有由"短书"变长

的趋势，大体可归为三个类型：一是地理博物体，二是杂史杂传体，三是杂记体。该书在搜集材料和考订作品真伪、版本异同方面，很有长处；修订本对一些作品再作考据论证，重新认定时代，删除其中伪书，补充新材料和新的学术成果，在文献上更加扎实。

作者另编有《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可以配合使用。

中古文学系年

陆侃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初版。

这部遗著是作者自 1937 年开始陆续编写而成的，初稿完成于 1947 年，此后不断修订，直至 1978 年作者去世。

据作者 1947 年所写《序例》，“中古”这个概念，在作者心目中，原来指公元一至五、六世纪。而作者研究中古文学史的计划原来也拟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把当时文人的事迹和作品按年代考定排列，第二步是就当时文学的社会经济背景方面加以探讨，分若干专题写成论文，第三步是写一部断代的文学史。由此可知，这部系年，只是作者为他的中古文学史研究所做基础性的工作，也是一个未完成的工作——现在出版的这部遗著，起自汉宣帝甘露元年（前 53）扬雄出生，却仅止于卢谌被害的晋穆帝永和七年（351）——但它终归为魏晋文学研究奠定了一个相当好的文献学基础。

继该书之后，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 年出版了张可礼编纂的《东晋文艺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又出版了曹道衡、刘跃进编纂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包括“前编”的十

六国文学编年(279—419)、"正编"的南北朝文学编年(420—589)和"后编"的隋代文学编年(590—618)。以这三部编年著作相配合,恰可以全面展现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样貌。

六朝文学论稿

〔日〕兴膳宏著,彭恩华译,岳麓书社 1986 年初版。

该书收入作者亲自选定的写于 1960—1980 年代的有关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论文十九篇,这些论文,与此前出版的《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彭恩华译,齐鲁书社,1984年)和此后出版的《异域之眼——兴膳宏中国古典论集》(戴燕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初版)两部论文集,所收论文大约三十篇,包括《潘岳年谱稿》、《宋书谢灵运传论综说》、《玉台新咏成书考》、《书法历史中的陶弘景与〈真诰〉》、《梁元帝萧绎的生涯和〈金楼子〉》、《〈隋书经籍志详考〉解说》等,大体上代表了作者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方面的成绩,也多少反映出日本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界在最近几十年的一个基本状况:第一,是在仍然保持着日本中国学于文献解读上的优势的同时,也不乏与欧美学界以及中国学界的对话;第二,是突破传统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界限,把视野拓宽到宗教史等领域。

作者近年在日本出版的另外两部著作,即他与川合康三合作的《隋书经籍志详考》(东京,汲古书院 1995 年)和由他主编的《六朝诗人传》(东京,大修馆 2000 年),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初版，2003 年增补本。

该书收入作者的八篇历史研究专论，其中《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都是讨论东汉魏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前一篇曾发表于 1959 年《新亚学报》第 4 卷第 1 期，是以士之“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为线索，说明汉晋时代知识阶层在内心方面发生的种种变化，侧重在解释汉末以至西晋初年名教崩溃的过程，后一篇揭出士风问题，进一步探讨魏晋思想的变迁，侧重在东晋以后门第社会新秩序的重建上面。

作者认为，名教危机下的魏晋士风是最近于个人主义的一种类型，但是另一方面，魏晋又正是士族开始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因此士的个体自由，是以家族本位的群体纲纪为其保障的，“情礼兼到”的内在限制，也依然是魏晋任诞之风的必然归宿。这两篇论文，对于完整、深入地理解与魏晋文学史相关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南北朝文学史

曹道衡、沈玉成编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初版。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列入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中国文学通史》之一种,也是目前最为精审、周详的一部南北朝文学专史。全书前十七章叙说南朝文学,第十八章至二十四章叙说北朝文学,第二十五叙说南北朝小说,最后两章叙说隋代文学及南北文学融合。

作者认为,南朝文学的大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美学价值得以突显,这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转折,尽管其中混杂了不健康的成分,而北朝文学的发展,是同少数民族的汉化以及北方文人接受南方文学的影响同步进行的,但总的来看,北朝文学偏重于实用,应用文学较为发达。南北文风的融合,如果从隋代的政治统一算起,要到初盛唐间,前后一百多年才正式完成。

根据《后记》,该书的撰写自 1981 年启动,至 1988 年完成,其间两位作者同时承担了中华书局组织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的编撰工作,因此整个 1980 年代,两位作者一直都在从事中古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继该书出版之后,由他们编撰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辞典》也于 1996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3 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他们合作的《中古文学史料丛考》。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

王运熙、杨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初版。

这是王运熙、顾易生主编多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的一个分卷,也是迄今最为周详的一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专著。全书分魏晋、南北朝各一编,魏晋编设绪论、曹魏、

西晋、东晋共四章,南北朝编设绪论、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北朝共五章。

作者认为,魏晋是一个思想解放、审美意识大发扬的时代,文学批评较之汉代有重大发展,南北朝时又出现有不少专书,依时代先后对作家作品加以评述,在文学批评方面更加系统和深入。魏晋时期的文学批评尚重在对作品体裁与风格之关系的讨论,而南北朝就扩展到了对作家个性与风格关系的探寻。

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

〔日〕小南一郎著,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初版,2006 年修订版。

该书包括了作者写于 1972—1978 年的四篇论文:西王母与七夕文化传承、《西京杂记》的传承者、《神仙传》——新神仙思想、《汉武帝内传》的形成。通过对流传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种传说的解读,它们从各个方面分别探讨了文艺是如何应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变动的问题。

作者借鉴西方的结构主义理论以及日本民俗学、传说史的研究模式,在前两篇论文中,重点分析指出中古时期的中国,有一种专门讲故事的人亦即他所谓"职业说话人"的存在;后两篇论文的重点,则在于分析神仙、道教思想与神仙传说之形成的关系,并以此探索中古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作者的研究,多少代表了最近的日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在方法与视野上的改变。

误入与谪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

李丰楙著,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初版。

这部论文集,收录了作者从1980年至1990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隋唐道教文学研究的论文,总计八篇。这也是作者继《魏晋南北朝文士与道教之关系》(博士论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六朝隋唐仙怪类道教小说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三书之后,出版的又一本专论道教文学的著作。书名取"误入与谪降",误入,指的是凡人进入仙界;谪降,指的是神仙被谪下凡间。这一对概念,大体上也涵盖了作者在八篇论文中所要讨论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有对神女传说、西王母故事等文学史中常见的这一类作品的诠释。作者凭借他对道教的体验以及对道经的钻研,在魏晋南北朝隋唐的道教文学如降真诗、神弦歌及游仙诗、神仙小说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魏晋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著,中华书局1996年初版。

这是继《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之后,作者撰写的又一部文学思想史,全书除引言和结束语而外,共十章:一建安的文学思想,二正始玄风与正始之音,三西晋士风与西晋文学思想,四东晋的文学思想,五元嘉

与永明的文学思想演变,六刘勰的文学思想(上),七刘勰的文学思想(中),八刘勰的文学思想(下),九文学思想的多元发展,十北朝的文学思想。

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发展的总趋势,是沿着重文学的艺术特质展开的,重抒情、重形式的美的探讨、重表现方法,文学与非文学逐步分离开来。而在描述这样一个文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作者特别注意到的是士人心态,并视之为文学思想与社会思潮乃至政局的中间环节,也就是说,每当政局及社会思潮发生变化,首先是对士人心态产生影响,然后间接影响到文学。1991 年,作者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可以与本书参看。

魏晋文学史

徐公持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初版。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中国文学通史》中的一种,也是历来最详尽的一部魏晋文学专史。全书分为三国文学、西晋文学、东晋文学三编,其中三国文学编专门设有吴蜀一章,是此前同类著作中比较少见的。

作者对于魏晋文学的基本看法,是认为三国前期建安文学的崇尚“风骨”以及后期受玄学影响的清远诗风,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带来新的贡献,西晋却是中国文学史上模拟风气最盛的一个时期,人才实盛,却未能创造第一流的作品。到了东晋,不仅人才锐减,文士也因热衷谈玄而失去了文学创作

的热情,文坛气象寂寞、格局狭小,但是,东晋文学在文体的多样化上有所进展,除了诗、赋、文等传统文体仍为士大夫所重,小说也应运而生。

乐府诗述论

王运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初版。

该书共有三个部分:上编“六朝乐府与民歌”,所收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5 年出版的作者同名著作,中编“乐府诗论丛”,所收为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出版的作者另一同名著作,下编“乐府诗再论”,收入不见于上述两书的作者其他论文。

本书讨论吴声、西曲以及乐府机构相当细致,有很多精到的见解,可以与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配合来读。其中的《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对乐府文献及相关论著有很好的介绍和点评,特别值得初入门者学习。



参考论著

一、论　　文

1900—1909

国学发微，刘师培，国粹学报第一至十四、十七、二十三期，1905年；邬国义、吴修艺编校《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910—1919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1917.2.1

论短篇小说，胡适，北京大学日刊1918.3.22-27；新青年4:5，1918.5.15

宋郭茂倩之乐府诗集，孟真，新潮1:1，1919.1

1920—1929

三国六朝的平民文学，胡适，国语月刊1:2，1922.3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37，1922.3

中国之托尔斯泰,甘蛰仙,北京晨报副刊 1922.8.1-11

文心雕龙的研究,杨鸿烈,晨报副刊 10,1922.10

江文通的文艺,甘蛰仙,晨报副刊 1922.12.21-31

读乐府诗集,王伯祥,学灯 1923.6

论曹子建诗,李开先,觉悟 1923.7-8.26-5

论汉魏以来迄隋唐古诗,陈钟凡,国学丛刊 2:4,1924.4

书文心雕龙明诗篇后,李冰若,国学丛刊 2:4,1924.4

中国式的文人曹子建,吴景超,清华周刊 317,1924.6

曹子建评传,吴溥,学灯 1924.8,2-8

谢灵运文学,叶瑛,学衡 33,1924.9

刘勰研究,吴熙,学灯 1924.9-10

为萧统的文学呼冤,杨鸿烈,晨报副刊 1924.12.11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 73,1924

谢康乐诗注序,黄节,学衡 39,1925.3

鲍照之思想及其文艺,刘大杰,晨报副镌 1925.3.26-29

孔雀东南飞考证,陆侃如,学灯 1925.5

孔雀东南飞之讨论,黄晦闻、陆侃如,学灯 1925.5

古诗十九首考,徐中舒,立达季刊 1,1925.6

木兰诗再考,徐中舒,东方杂志 22:14,1925.7

汉唐间外国音乐的输入,贺昌群,小说月报 20:1,1926.1

曹孟德诗派,何海鸣,小说世界,13:8,1926.2

木兰诗再考补篇,徐中舒,东方杂志 23:11,1926.6

魏晋文艺批评之趋势,王炽昌,国学丛刊 3:1,1926.8

萧梁文选及古文辞类纂编例之比观,王锡睿,国学丛刊 3:1,1926.8

读文心雕龙,陈延杰,东方杂志 23:23,1926.12

曹子建七步诗质疑,张为骐,国学月刊 2:1,1927.1

陶公生年考——跋古层冰《陶靖节年谱》,陆侃如,国学论丛 1:1,1927

刘勰评传,刘节,国学月报 2:3,1927.3

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徐中舒,东方杂志 24:18,1927

木兰诗时代辩疑,张为骐,国学月刊 2:4,1927.4

魏晋诗研究,陈延杰,小说月报 17 号外《中国文学研究》,1927.6

中世人的苦闷与游仙的文学,滕固,小说月报 17 卷号外,1927.6

谢朓年谱,伍叔傥,小说月报 17 卷号外,1927.6

萧统评传,谢康,小说月报 17 卷号外,1927.6

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梁绳祎,小说月报 17 号外,1927.6

中国旧诗篇中的声调问题,刘大白,小说月报 17 卷号外,1927.6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广州《民国日报》1927.8.11-13、15-17;《北新》2:2,1927.11.16

《孔雀东南飞》的年代,胡适,现代评论 6:149,1927.10.15

《孔雀东南飞》时代袪疑,张为骐,国学月报 2:11

《孔雀东南飞》年代的讨论,张为骐,国学月报 2:12

陶公年纪辨疑,游国恩,国学月报汇刊 1,1928.1

陶公生年考,陆侃如,国学月报汇刊 1,1928.1

莲社成立年月考,游国恩,国学月报汇刊 1,1928.1

论《孔雀东南飞》,答胡适之先生,张为骐,国学月报 2:12,1928

顾黄合校文心雕龙序,陈准,图书馆季刊 2:2,1928.3

评陈延杰诗品注,蠡舟,大公报文学副刊 1928.7.9

刘勰的作文法论,戚维翰,学生杂志 15:9,1928.9

文选篇题考误,刘盼遂,国学论丛 1:4,1928.10

读曹子建诗札记,萧涤非,学衡 7,1929:7

梁代之文学批评,姚卿云,艺林 1,1929.9

读宋椠五臣注文选记,顾廷龙,史语所周刊 9:102,1929.10

鲍明远的纯文艺,甘蛰仙,戏剧与文艺 1:7,1929.11

谢康乐年谱,丁陶庵,京报文学周刊 41-42,1929.11

唐钞本文选残篇跋,狩野直喜,史语所周刊 10:109,1929.12

文章流别论与翰林论,郭绍虞,燕大月刊 5:3,1929.12

1930—1939

魏晋南北朝诗之演变大势,张长弓,燕大月刊 6:1,1930.3

咏怀诗笺,黄侃,东北丛刊 3,1930.5

清商曲辞研究,张长弓,燕大月刊 6:3,1930.10

木兰诗作于韦元甫考,罗根泽,朝华 2:3,1930.12

六朝文学概论,施章,中央大学半月刊 2:8,1931.1

魏晋六朝文学批评,皇甫颜,文艺月报(开封)1931.1

汉魏六朝诗派衍实略说,徐英,安大季刊 1:4

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陈寅恪,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 1:1,1931.4

读颜氏家训后,杨树达,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 1:1,1931.4

梁昭明太子年谱,周贞亮,武汉大学文哲季刊 2:1,1931.4

左芬墓志铭,浦江清,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 1:2,1931.5.15

北朝社会的形态与文学的演变,王礼锡,读书杂志 1:2,1931.5

文选学自序,骆鸿凯,国学丛编 1:2,1931.7

读谢康乐诗札记,萧涤非,清华文学会周刊 1:4,1931.8

昭明文选流传之原因,家雁,清华周刊 38:12,1932

鲍明远年谱,缪钺,文学月刊 3:1,1932

文选书录述要,蒋镜寰,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刊 3,1932.4

文心雕龙黄注补正,马叙伦,文学月刊 3:1,1932.5

梁沈约四声谱唐释神珙五音九弄图释,曾皎然,朝华 3:

1,1932.6

所谓修文殿御览者,洪业,燕京学报 12,1932.12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陈寅恪,历史语言所集刊 3:4,1933

读陶云订陶靖节集注札记,层冰,文学杂志(中山大学)4,1933.5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张玉林,读书杂志 3:6,1933,6

谢灵运诗研究,许文雨,国风半月刊 2:11,1933.6

任昉文章缘起,兰襟,女师学院期刊 1:2,1933.7

文选札记(论子虚赋),层冰,文学杂志(中山大学)5,1933.9

汉晋六朝之散乐百戏,戏学月刊 1:9-10,1933.9-10

汉魏乐府释音,王越,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 2:1,1933

鲍明远诗蠡测,王正履,无锡国专季刊 1,1933

六朝唐代反语考,刘盼遂,清华学报 9:1,1933.12

世说新语校笺叙,刘盼遂,文学同盟 11,1934

萧选、姚纂、曾钞在文学上之分析,陈冠一,北平月刊 1-3,1934

钟嵘之汉魏以来诗派,沙少海,珞珈 1:4,1934.2

谢灵运文学,叶瑛,青年界 5:3,1934.3

东晋对于异族之抵抗精神,张君劢,中大文史月刊 3,1934.3

文选中惨死的作家,冉昭德,励学(山东大学)2,1934.6

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朱自清,清华学报 9:3,1934.7

文心雕龙分析之研究,陈冠一,北平月刊 8-9,1934

谢灵运的游名山志,邹啸,青年界 8:2,1934.9

梁鼓角横吹曲用北歌解,孙楷第,燕京学报 16,1934.12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永明声病说,郭绍虞,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 1935.3.13;《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 1983

文选类例正失,徐英,安徽大学月刊 2:5,1935.3

六朝文学与佛教影响,蒋维乔,国学论衡 6,1935.12

读选导言,骆鸿凯,学术世界 1:7,1935.12

选学源流,骆鸿凯,制言 8-10,1936.1-2

选学书著录,骆鸿凯,制言 11,1936.3

古直笺陶靖节诗笺定本,朱自清,清华学报 11:2,1936.4

文心雕龙时序篇述义,刘永济,武大文哲季刊 5:4-6:1,1936

与黄轩祖论文选分类学,汪辟疆,制言 18,1936.6

南北朝诗人用韵考,王力,清华学报 11:3,1936

凉州曲小考,罗根泽,北平晨报学园 971.1936.6.25

世传陶集卷第略考,古直,语言文学专刊 1:2,1936.6

广陵散考,戴明扬,辅仁学志 5:1-2,1936.12

东晋南朝之吴语,陈寅恪,史语所集刊 7:1,1936.12

宋书乐志相和歌十三曲校释,夏敬观,艺文 1:5-6,1936

陶集考辨,郭绍虞,燕京学报 20,1936.12

文选学考,许世瑛,国闻周报 14:10,1937.3

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赵万里,清华学报 3,1937.4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杨明照,燕大国文学会文学年报 3,1937.5

木兰诗的时代,曲滢先,历史与考古 4,1937.6

梁武帝,陈竞明,大公报史地周刊 144,1937.7

汉唐间之异物志,王庸,史地杂志 1:2,1937.7

沈约与宋书,柳定生,史地杂志 1:2,1937.7

乐府诗集作家名品考异,余冠英,语言与文学 1937

汉魏六朝地学问上文学,长泽规矩也,东洋文化史大系 2,1938

论文选音残卷之作者及其方音,周祖谟,辅仁学志 8:1,1939

读洛阳伽蓝记书后,陈寅恪,史语所集刊 8:2,1939.9

1940—1949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学灯 1940;《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读哀江南赋,陈寅恪,清华学报 13:1,1941.4

梁书刘勰传笺注,杨明照,文学年报(燕京大学国文学会)7,1941.6

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徐高阮,史语所集刊 22,1941.7

中古诗人小记,陆侃如,志林 1942.2

印度文学及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何家槐，文化杂志 2:5，1942.7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萧涤非，图书季刊 6:1-2，1944-45

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周祖谟，辅仁学志 12:1-2，1945.12

论永明诗，公方苓，中央日报 7，1946.7.22

谢灵运辨宗论书后，汤用彤，大公报 1946.10.23

六朝文学与佛教影响，蒋维乔，国学论衡 6，1946.12

论吴声歌曲中的子夜歌群，游国恩，平明日报 1947.1.12，收入《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9

钟嵘诗品序疏证，王叔岷，中央日报 9，1947.12.15

魏晋文学与思想，汤用彤，魏晋玄学讲演提纲，1947 年，收入《汤用彤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余冠英，1947，收入余氏《汉魏六朝诗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说“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余冠英，1947，收入余氏《汉魏六朝诗论丛》

论佛典翻译文学，周一良，申报文史副刊第 3-5 期，1947.12.20、27；1948.1.10

谢灵运诗源流考，许文雨，中央日报 1948.2.16

讲史与咏史诗，张政烺，史语所集刊 1948.4

文选撰出年代考，逯钦立，学原 2:1，1948.5

陶渊明年谱稿，逯钦立，史语所集刊 20:1，1948.6

形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逯钦立，史语所集刊 16:1，

1948,6

述酒诗题注释疑,逯钦立,史语所集刊 18,1948.9

颜延之年谱,缪钺,中国文化研究 8,1948.9

颜氏家训、金楼子“伐鼓”解,周法高,史语所集刊 13,1948.9

陶渊明里居史料评述,逯钦立,说文 5:1-2,1948.11

文选编撰时期及论者考略,何融,国文月刊 76,1949.2

论钟嵘评陶渊明诗,王叔岷,学原 2:4,1949.4

论文选注及其版本,祝文仪,学原 2:8,1949.8

洛神赋与闲情赋,逯钦立,学原 2:1,1949

四声三问,陈寅恪,清华学报 9:2

从史实论切韵,陈寅恪,岭南学报 9:2

1950—1959

山水诗人谢灵运,张秉权,大公报 8,1950.5.8

陶渊明,王瑶,光明日报 1950.7.5

魏晋思想之历史背景与阶级根源,侯外庐,新建设 1950.4 期

陶渊明作品系年,李辰冬,大陆杂志 2:3-4,1951.2

晋末宋初的山水诗与山水画,廖蔚卿,大陆杂志 4:4,1951.2

钟嵘诗品疏证,王叔岷,学原 3:3-4,1951.4

陶渊明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蓉媛,燕京学报 1951.6

《典论论文》和答李翊书所说的气,童寿,大陆杂志 3:

11,1951.12

刘勰的风格论,廖蔚卿,大陆杂志 6:6,1953.3

嵇康集考,鲁迅遗著,历史研究,1954.2 期

文心雕龙与佛教,饶宗颐,民主评论 5:5,1954.3

《木兰诗》产生的时代和地点,罗根泽,光明日报 1954.4.26 文学遗产 5

《木兰诗》产生时代和地点的讨论,郭明忠、罗根泽,光明日报 1954.7.18

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它的政治背景,汤用彤等,历史研究 1954.3 期

论建安曹氏父子的诗,余冠英,文学遗产增刊第 1 辑

论曹植的诗,张志岳,文学遗产增刊第 1 辑

试论陶渊明,易润芝,文学遗产增刊第 1 辑

鲍照和他的作品,陈贻焮,文学遗产增刊第 1 辑

评罗根泽先生关于《木兰诗》的两篇考据文章,徐朔方,文学遗产增刊第 1 辑

从杜甫、白居易、元稹诗看《木兰诗》的时代,萧涤非,文学遗产增刊第 1 辑

《木兰诗》产生时代和地点的讨论,郭明忠、罗根泽,光明日报 1954.7.18 文学遗产 12

从《孔雀东南飞》的地理背景谈孔雀东南飞,孙望,光明日报 1954.9.7 文学遗产 19 期

《孔雀东南飞》是何时写定的,熙仲,光明日报 1954.9.7 文学遗产 19 期

魏晋五言诗,王瑶,文艺学习 1954.9 期

刘勰论时代与文风,廖蔚卿,大陆杂志 9:10,1954.11

刘勰的创作论,廖蔚卿,文史哲学报 6,1954.12

论谢灵运,张秉权,大陆杂志 11:2,1955.7

略谈鲍照,罗根泽,光明日报 1955.9.25 文学遗产 23

论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社会根源,范宁,历史研究 1955.6 期

论刘勰的文学主张——文心雕龙研究之一,黄海章,中山大学学报 1956.3

七言诗形式的发展与完成,王运熙,复旦学报 1956.2 期

怎样理解"建安风骨",金申熊,光明日报 1956.4.8

文选李注纂例,李维棻,大陆杂志 12:7,1956.4

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陈寅恪,中山大学学报 3,1956.3 期

关于陶渊明,陈贻焮,文学遗产增刊第 2 辑,1956.7

日本古钞文选五臣注残卷,饶宗颐,东方文化 3:2,1956.7

梁书庐陵王续传夺伪,严耕望,大陆杂志 13:2,1956.7

陶渊明行年杂考,劳榦,自由学人 1:3,1956.10

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之关系,饶宗颐,香港大学中文学会会刊 1956

魏晋清谈的实质和影响,任继愈,历史教学 1956.10 期

试论刘勰文学批评现实性,吴林伯,文史哲 1956.10

从新编系年《陶渊明集》谈古典文学的整理工作,齐放,

光明日报 1956.12.9

曹操的短歌行新解,许龄,香港大学中文学会会刊,1956

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附论东晋南朝地方官俸及当时士大夫食量诸问题,缪钺,历史研究 1957.1

谢灵运诗的斗争性与创造性,戴锡樟,学术论坛 1957.1 期

读《诗品》,罗根泽,光明日报 1957.3.10 文学遗产第 147 期

论魏晋志怪小说的传播和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关系,范宁,北大学报 1957.2 期

中国文学史讲话(魏晋南北朝),张志岳,哈尔滨文艺 1957.2 期

徐孝穆行年纪略,冯承基,幼狮学报 2:2,1957.4

关于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几项问题,郑骞,中央日报 6,1957.6.18

试论《世说新语》,刘叶秋,语文学习 6,1957.6

文心雕龙初探,刘绶松,文学研究 2,1957.6

释刘勰"三准"论,刘永济,文学研究 2,1957.6

《世说新语》里的晋宋口语释义,徐震堮,华东师大学报 1957.3 期

鲍照与《芜城赋》,孙楷第,光明日报 1957.7.7 文学遗产 164 期

陶侃及陶渊明是汉族还是溪族呢?——与陈寅恪教授商榷所谓江左名人如陶侃及渊明亦出于溪族的结论,古直,

光明日报 1957.7.14 文学遗产 165 期

关于周颙《三宗论》的三宗义,黄忏华,现代佛学 6,1957.7

陶渊明事迹新探,段熙仲,文学研究 1957.3 期

钟嵘生卒年代考,王达津,光明日报 1957.8.18 文学遗产 170 期

曹植的作品分期,李辰冬,大陆杂志 15:4,1957.8

谢灵运年谱,郝昺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1957.3 期

鲍照研究,曾君一,四川大学学报 1957.4 期

试论文心雕龙,郭绍虞,语文学习 9,1957.9

对于《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的商榷,张志明、缪钺,历史研究 1957.10 期

关于陶渊明思想的几个问题,曹道衡,文学遗产增刊第 5 辑,1957.12

僧祐律师的文化生活,谷响,现代佛学 4,1957

书《魏书萧衍传》后,陈寅恪,中山大学学报 1958.1

魏晋和唐宋时期汉文学在云南的传播,方国瑜,云南大学学报(人文),1958.1 期

读《鲍照研究》,李伯勋等,四川大学学报 1958.1 期

《洛神赋》成于黄初四年考,阮廷卓,大陆杂志 16:1,1958.1

读文选,钱穆,新亚学报 3:2,1958.2

敦煌本文选斠证(一、二),饶宗颐,新亚学报 3:2,

1958.2

陶渊明的世系问题，古直，光明日报 1958.3.9 文学遗产 199 期

《博异志》作者问题质疑，王达津，光明日报 1958.4.13

论晋代的隐逸思想与隐逸诗人，傅懋勉，文史哲 4，1958.4

沈约，王公玙，中国文学史论集 1，1958.4

刘勰，熊公哲，中国文学史论集 1，1958.4

徐陵，冯承基，中国文学史论集 1，1958.4

江淹，包明叔，中国文学史论集 1，1958.4

陶渊明的年纪问题，古直，光明日报 1958.5.25 文学遗产 210 期

汉魏两晋南北朝群书校释录要，王佩诤，华东师大学报 1958.3 期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简论，刘叶秋，新建设 1958.4 期

刘勰的创作论和批评论——文心研究之二，黄海章，中山大学学报 1958.4

论晋代的隐逸思想和隐逸诗人，傅懋勉，文史哲 1958.4 期

读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陈启云，新亚生活 1:3，1958.6

选学考，邱燮友，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 3，1959.6

《夸饰》篇后记，顾随，河北日报 1959.6.7-21

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徐复观,东海学报 1:1,1959.6 汉晋之际士之新知觉与新思潮,余英时,新亚学报 4:1,1959.8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罗常培,文史杂志 1:8,1959.8

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谭其骧,学术月刊,1959.8

钟嵘诗品谢灵运条订误,郑骞,台湾新生报 8,1959

试谈刘勰论"风骨",王达津,光明日报 1959.9.13 文学遗产 278 期

试论谢灵运及其山水诗,曹道衡,光明日报 1959.9.20 文学遗产 279 期

论庾信及其诗赋,刘开扬,文学遗产增刊第 7 辑,1959.12

略论鲍照和他的诗,高海夫,人文杂志 6,1959.12

论谢灵运的山水诗,林文月,文星 5:2,1959.12

文心雕龙与南朝文学,孟戈,文学世界 2,1959.12

论《吴越春秋》为汉晋间说部及其在艺术上的成就,陈中凡,文学遗产增刊第 7 辑

1960—1969

《洛阳伽蓝记》试论,罗根泽,光明日报 1960.1.30 文学遗产 298

颜之推观我生赋与庾信哀江南赋之比较,周法高,大陆杂志 10:4,1960.2

刘彦和身世考,张严,大陆杂志 20:4,1960

谢灵运的山水诗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吗? 潘仁山,光明日

报1960.3.6文学遗产303期

论陆机的《文赋》,胡国瑞,光明日报1960.4.17文学遗产309期

关于刘勰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毛任秋,文学遗产选集3,1960.5

答毛任秋"关于刘勰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郭绍虞,文学遗产选集3,1960.5

关于文心雕龙的评价问题及其他,郭绍虞,文学遗产选集3,1960.5

葛洪的文学主张,杨明照,光明日报1960.6.19文学遗产318期

文心雕龙校本考,张严,大陆杂志20:11,1960.6

略论鲍照和他的诗,高海夫,人文杂志1960.6期

《文心雕龙》论创作方法,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小组,光明日报1960.9.18文学遗产331

山水诗与自然美,朱光潜,文学评论1960.6期

颜之推的文学评论与作品,缪钺,光明日报1961.1.22文学遗产348期

评介《陶渊明诗文汇评》,袁行霈,北京大学学报(人文)1961.1期

陆机《文赋》二例,陆侃如,文学评论1961.1期

关于山水诗画的点滴感想,宗白华,文学评论1961.1期

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本刊编辑部,文学评论1961.6期

论葛洪,杨向奎,文史哲 1961.1 期

《文心雕龙》中浪漫主义的一些论点,陆侃如,山东大学学报 1961.1 期

家训文学的源流(上中下),周法高,大陆杂志 22:2-3-4,1961.1-3

江淹及其作品,曹道衡,光明日报 1961.3.19 文学遗产 355 期

关于《孔雀东南飞》疑义,余冠英,文学评论 1961.2 期

试论萧统的文学批评,李嘉言,文学评论 1961.2 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藏书,刘汝霖,图书馆 1961.3 期

刘勰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初探,曹道衡,光明日报 1961.4.16 文学遗产 359 期

关于范缜与“神不灭者”争论史实的考证,汤一介,文汇报 1661.4.14

笺注徐孝穆集引史正误,冯承基,幼狮学报 3:2,1961.4

沈约刘勰钟嵘三家讨论比较研究,舒衷正,政治大学学报 3,1961.5

颜之推《还冤记》考证(上中下),周法高,大陆杂志 22:9-10-11,1961.5-7

颜氏家训汇注补遗,周法高,史语所集刊外编四种下 1961.6

文心雕龙校勘新补序,张严,大陆杂志 23:2,1961.7

笺注徐孝穆集所注故实之商榷,冯承基,大陆杂志 23:1,1961.7

《文心雕龙》的文学批评论,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理论史》编写组,江海学刊 1961.7

说“风骨”,马茂元,文汇报 1961.7.12

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王运熙,文汇报 1961.7.29

论陆机《文赋》中之所谓“意”,郭绍虞,文学评论 1961.4 期

也谈山水诗的产生问题,袁行霈,文学评论 1961.4 期

颜之推的文学、训诂、声韵、校勘之学,缪钺,文汇报 1961.8.20

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王运熙,光明日报 1961.8.27 文学遗产 378 期

文心雕龙五十篇编次及隐秀篇真伪评议,张严,大陆杂志 23:8,1961.10

《文心雕龙·风骨》浅释,郝昺衡,学术月刊 1961.10 期

《文选》的选录标准和它与《文心雕龙》的关系,郭绍虞,光明日报 1961.11.5 文学遗产 387

说“通变”,马茂元,江海学刊 1961.11

齐梁文艺批评中的风骨论,詹锳,光明日报 1961.12.10 文学遗产 392

《文心雕龙·辨骚》的从新认识,段熙仲,光明日报 1961.11.17 文学遗产 393

文心雕龙论“道”,陆侃如,文史哲 3,1961.12

历代文心雕龙品评概举,张严,大陆杂志 24:2,1962.1

陈寿与《三国志》,缪钺,历史教学,1962.1 期

兰亭帖考,启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62.1 期

刘勰的生平和思想,陆侃如等,山东文学 1962.1

刘勰的文体论,陆侃如,山东文学 1962.2

论西京杂记之作者及成书年代,劳榦,历史语言所集刊 33,1962.2

敦煌六朝写本毛诗注残页斠记,苏莹辉,孔孟学报 3,1962.4

昭明文选白居易文集对日本古代文学界的影响,曹光锟,学粹 4:3,1962.4

颜氏家训斠注补录,王叔岷,大陆杂志特刊 2:2,1962.5

关于陆机《文赋》的三个问题,夏承焘,文艺报 1962.7 期

略谈黄季刚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及风骨问题,曹冷泉,光明日报 1962.6.3

校读偶记——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里的错字,殷孟伦,文学遗产增刊第 10 辑,1962.7

范晔《后汉书》的序论,王运熙,文学遗产增刊第 10 辑,1962.7

李白为什么景仰谢朓,申炎,文汇报 1962.7.28

魏晋六朝文学批评的发展,林庚,新华月报 1962.8 期

读《文赋》札记,万曼,光明日报 1962.9.2 文学遗产 430 期

读《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湛之,光明日报 1962.9.23

《翰林论》作者质疑,程弘,文史 1,1962.10

文选六臣注订讹,祝廉先,文史 1,1962.10

读《汉书》《后汉书》札记，黄侃，文史1,1962.10

对刘勰世界观问题的商榷，曹道衡，文学遗产增刊11,1962.10

略论阮籍及其《咏怀》诗，张志岳，文学遗产增刊11,1962.10

试论讲文通的《恨赋》和《别赋》，乔正康，扬州师院学报16,1962

葛洪的文学观，陆侃如、牟世金，山东大学学报1963.1期

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殷孟伦，文史哲1963.1期

世说新语中第一身称代词研究，许世瑛，淡江学报2,1963.2

左思评传，陆侃如，山东文学1963.2

《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王运熙，学术月刊1963.2期

文选任彦升奏弹刘整题下注考辨，冯承基，幼狮学志2:3,1963.4

文选五臣注北山移文本事辨正，冯承基，大陆杂志26:10,1963.5

四声五音及其在汉魏六朝文学中之应用，詹锳，中华文史论丛3,1963.5

《文心雕龙》论“道”，陆侃如，文史哲1963.3期

关于《文赋》的评价，郭绍虞，文学评论1963.4期

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钱穆，新亚学报5:2,1963.8

《典论论文》与后世之论文气,邝利安,文学世界7:3,1963.10

释"双题",李次钱,文史第3辑,1963.10

再说西京杂记,洪业,历史语言所集刊34本,1963

再论永明声病说,郭绍虞,中华文史论丛4,1963.10

萧衍、李白《上云乐》的体和用,任本壗,中华文史论丛2,1963.11

颜氏家训斠注补遗,王叔岷,文史哲学报12,1963.11

谢灵运诗论,邓仕樑,华国4,1963.12

论文选赋类区分情志之义答直方,饶宗颐,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年刊1963.12

佛教对于六朝文学的影响,李嘉言,开封师院学报1964.1

陈寿、袁宏和范晔,白寿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4.1期

读陶管见,逯钦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64.1期

四声绎说,夏承焘,中华文史论丛5.1964.6

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周勋初,中华文史论丛5,1964.6

读《世说新语》札记,陈直,中华文史论丛5,1964.6

论宫体诗的问题,胡念贻,新建设1964.5-6期

论文选李善注"五岳",冯承基,大陆杂志29:2,1964.10

木兰诗考,李纯胜,大陆杂志31:12,1965.2

关于宫体诗的若干问题——与胡念贻同志商榷,周勋初,新建设1965.3期

古诗十九首用韵考,唐亦璋,淡江学报 1965.4

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郭沫若,文物 1965.6 期

《兰亭序》的真伪驳议,高二适,光明日报 1965.7.23

论《兰亭序》的两封信,宗白华,光明日报 1965.7.30

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严北溟,学术月刊 1965.8

《驳议》的商讨,郭沫若,光明日报 1965.8.24

不要在糟粕中找精华——评《论宫体诗的问题》,公盾,光明日报 1965.10.10

论永明声律——四声,冯承基,大陆杂志 31:9,1965.11

从《萧翼赚兰亭图》谈到《兰亭序》的伪作问题,史树青,文物,1965.12 期

世说新语中第二身称代词研究,许世瑛,史语所集刊 36,1965.12

如何评价庾信及其作品中的"故国之思",张可礼,文史哲 1966.2 期

再论永明声律——八病,冯承基,大陆杂志 32:4,1966.2

谈木兰辞用韵,许世瑛,图书 1:6,1966.6

鲍照年谱补正,吴德风,幼狮学志 5:1,1966.8

南朝宫体诗研究,林文月,文史哲学报 1966.12

谢灵运及其诗,林文月,台大中文文史丛刊 17,1966

梁简文帝与宫体诗,林文月,纯文学 1:1,1967.1

文选别赋李注补正,胡楚生,南洋大学学报1,1967

曹子建年谱新编(上中下),邓永康,大陆杂志34:1-3,1967.6-8

论孔雀东南飞用韵,许世瑛,淡江学报,1967.6

有关谢朓诗文注正误,洪顺隆,大陆杂志35:9,1967.11

谢朓生平及其作品研究,洪顺隆,东方杂志复刊1:9,1968.4

魏晋南北朝诗选,王伊同,清华学报7:1,1968.8

梁诗作者考,朱秉义,幼狮学志7:3-4,1968.11-12

六朝诗的演变,邓中龙,东方杂志2:6,1968.12

建安徐幹的儒者本色,梁容若,孔孟月刊7:7,1969.3

谢灵运与山水诗,李曰刚,文风15,1969.6

宋诗作者考,朱秉义,幼狮学志8:2,1969.7

1970—1979

魏晋乐府诗解题,方祖燊,台湾师大学报1970.6期

梁高僧传所载道安事迹之研究,明复,中国佛教15:7,1971.3

梁高僧传所载竺昙摩罗察事迹研究,明复,中国佛教15:9,1971.5

谢灵运诗评,孙克宽,中国诗季刊2:3,1971.9

山水诗人谢玄晖,方祖燊,新时代11:10,1971.10

鲍照,方祖燊,国文学报1,1972.6

魏晋诗韵考,林炯阳,台师大国文研究集刊1972.6

梁刘彦和先生年谱稿,王更生,国文学报 2,1973.4

魏书崔浩传笺注,王伊同,华冈学报 7,1973-1974

世说四科对论语四科的因袭与嬗变,傅锡壬,淡江学报(文学与商学)12,1974.3

世说新语文学篇补笺,王叔岷,南洋大学学报 8:8-9,1974-1975

遵儒反法的文艺思想家——刘勰,顾农,文史哲 1975.2 期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清谈论辨的主题,林丽真,书目季刊 10:4,1977.3

文选选赋义例论略,何沛雄,书目季刊 11:2,1977.9

由鲍照诗看六朝的人生孤愤,龚鹏程,鹅湖 3:4,1977.10

关于竹林之游的时间(读史札记),陆钊珑,历史研究 1978.7 期

刘勰卒年考,李庆甲,文学评论丛刊 1,1978.10

鲍照与杜甫,吕正惠,幼狮学志 15:2,1978.12

魏晋文学思想的述论,台静农,中国文学史论选集(罗联添编)第 2 册,台北,学生书局 1978

梁书刘勰传笺注,杨明照,中华文史论丛 1979.1 辑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王元化,中华文史论丛 1979.1 辑

鲍照及其诗新探,张志岳,文学评论 1979.1 期

读《文选》札记,徐复,南京师范学院学报 1979.1 期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评价,顾随,河北大学学报 1979.1 期

《世说新语》探源,刘兆云,新疆大学学报 1979.1-2 期

左思《三都赋》写作年代质疑,傅璇琮,中华文史论丛 1979.2 辑

曹植诗歌的写作年代问题,徐公持,文史 6,1979.6

《世说新语》的日本注本,白化文、李明辰,文史 6,1979.6

《重别周尚书二首》之二非庾信作,许逸民,文史 6,1979.6

《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王元化,历史学 1979.2 期

南北朝的诗风与新体诗的兴起,马积高,语文教学(湖南),1979.5 期

略论西晋的讽刺散文,曹道衡,语言文学,1979.5 期

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王运熙,郑州大学学报 1979.4 期

刘越石诗笺释,高越天,中国诗季刊(台湾)1979.4 期

蜂腰鹤膝解,郭绍虞,社会科学战线 1979.3 期

《世说新语》简论——附《世说新语》词语简释,徐震堮,中华文史论丛 1979.10

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宗白华,文艺论丛 1979.6 辑

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袁行霈,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 1,1979.12

刘勰《灭惑论》撰年考，杨明照，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1，1979.12

1980—1989

论魏晋至唐关于艺术形象的认识——兼论佛学输入对于艺术形象理论的影响，敏泽，文学评论1980.1期

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王运熙，文学遗产1980.1期

法显及其《佛国记》的几个问题，靳生禾，山西大学学报1980.1期

沈约籍贯考，崔富章，杭州大学学报1980.1期

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高敏，郑州大学学报1980,1期

论范晔之死，陈光崇，史学史资料1980.1期

建安文学繁荣兴盛的原因，钟优民，学术研究丛刊1980.2期

《世说新语》中称数法，庄正容，中国语文1980.3期

十六国文学家考略(上下)，曹道衡，文史13-14，1980.3

略论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曹道衡，文学遗产1980.2期

谈汉魏六朝文学之钞书用典与模拟之风，李嘉言、何法周，郑州师专学报，1980.2期

梁武帝研究，刘淑芬，中山学术文化集刊25，1980.5

幽冥录研究，王国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论集2，1980.6

宋人记载中的庾信佚作,许逸民,文学评论丛刊 5,1980.3

《洛阳伽蓝记》的几条补注,周一良,文献 1980.3

《世说新语》原名考略,周本淳,中华文史论丛 3,1980

颜氏家训之文学观,王开府,国文学报 9,1980.6

论庾信及其"乡关之思",张明非,文学遗产 1980.3 期

从扬州文选楼谈《文选》和文选学,张旭光,扬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0.3 期

颜延之与独秀峰,张万钧,学术论坛 1980.4 期

鲍照诗小论,吕正惠,文学评论 6,1980.5

钟嵘与《诗品》考年及其他,段熙仲,文学评论丛刊 5

关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曹道衡,文学评论丛刊 7.1980

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王运熙,文史 9

鲍照描写妇女的诗及其宫体诗的关系,史年椿,扬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0.3 期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校评,章太炎遗作,历史论丛第 1 辑,1980.8

《兰亭序》真伪考,周绍良,中国社会科学 1980.4 期

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王运熙,文学评论 1980.5 期

庾信《哀江南赋》四解,曹道衡,中华文史论丛 3,1980.12

汉魏六朝文学概述,王瑶,文史知识 1981.1-3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札记，曹道衡，中华文史论丛 1 辑，1981

古四声平议，俞敏，训诂研究 1981.1 期

关于《敕勒歌》的创作背景、作者及其他，吴庚舜、侯尔瑞，河北师院学报 1981.1 期

何逊诗用韵的研究，李金星，东海中文学报 2，1981.4

梁武帝萧衍与佛教，方立天，世界宗教研究 1981.4 期

论陶弘景，王明，世界宗教研究 1，1981.4-6

敦煌本《还冤记》考校，林聪明，书目季刊 15:1，1981.6

论鲍照诗歌的几个问题，曹道衡，社会科学战线 2，1981

《敕勒歌》校注评考钞略，梁洪謌，内蒙古大学学报 1981.3 期

建安七子论，徐公恃，文学评论，1981.4 期

曹丕"文气"说刍议，陈植锷，文学遗产 1981，4

世说新语作者问题商榷——附刘义庆年谱，萧虹，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 14:1，1981.6

鲁迅笔下的魏晋文学，郭预衡，山西师院学报，1981.3

读《世说新语》札记，周纪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1.4

朱铸禹先生《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序，朱一玄，南开大学学报 1981.4 期

大藏经上为何未收刘勰集传，高琇国，海潮音 62:8，1981.8

关于《木兰诗》的时代，许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1.5 期

从《世说新语》看清谈,孔繁,文史哲 1981.6 期

《世说新语》札记,白化文,学林漫录 4,1981.10

中古文学丛考,傅璇琮、沈玉成,中华文史论丛 3,1981,10-12 月

鲍照五题,段熙仲,文学遗产,1981.4 期

《文心雕龙》与《文选》在"选文定篇"及评文标准上的比较,齐益寿,古典文学 3,1981

读书札记:刘勰为什么要依沙门僧祐?——读《梁书刘勰传》,张少康,北京大学学报 1981.6

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特点,韦凤娟,学习与思考 1981.6 期

洛阳伽蓝记札记兼评周祖谟校释,王伊同,史语所集刊 51:2,1981.12

论谢朓诗歌的艺术成就,沈松勤,杭州大学学报 1981.12-1982.3

敕勒之歌——它的原来的语言与在文学上的意义,小川环树,北京大学学报 1982.1 期

刘勰的两个梦,周勋初,南京大学学报 1982.1 期

关于《木兰诗》的著录及其时代问题,齐天举,文学遗产增刊 14,1982.2

试论北朝文学,曹道衡,文学评论 1982.2 期

鲁迅论魏晋文学,戈之,关陇文学论丛 1,1982.3

魏晋文学史料考辨,沈玉成,文史 13,1982.3

试论《水经注》的文学成就,谭家健,文学遗产 1982.4 期

谢朓生平考略,葛晓音,艺谭 1982.4 期

何逊诗简论,李伯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1982.4 期

庾信的创作艺术,葛晓音,中州学刊 1982.4 期

世说新语中为何不见陶渊明,李栖,东方杂志 15:12,1982.6

论组诗《拟行路难》十八首的主题,王长发,南京大学学报 1982.2 期

由谢灵运诗与楚辞的关系看他的表现特色,(日)铃木敏雄,世界华学季刊 3:2,1982.6

潘岳系年考证,傅璇琮,文史 14,1982.7

"相和歌"曲调考,逯钦立遗著,文史 14,1982.7

魏晋以来山水诗"巧言切状"的玄学根源,韦凤娟,光明日报 1982.10.19 文学遗产 559 期

再论南北朝文学的几个问题,曹道衡,光明日报 1982.11.30 文学遗产 565 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札记,曹道衡,中华文史论丛 3-4,1982

曹丕曹植文学思想异同论,栾勋等,美学论丛 1982.2 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读后感,朱东润,社会科学战线 1982.3 期

沈约的宋书与史学,颜尚文,历史学报(师大)10,1982.6

齐梁间的散文佳品——读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徐公持,文史知识 1982.7

《哀江南赋》著作年代问题,王仲镛,中华文史论丛

1984.4 辑

《与朱元思书》漫谈,朱鉴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2.4 期

试论鲍照创作的艺术成就,朱思信,文学评论 1982.5 期

论鲍照的怀才不遇,王长发,江海学刊 1982.5 期

试论任昉,谭家健,文学评论丛刊 16,1982.10

魏晋的庄园经济与山水诗的兴起,韦凤娟,江汉论坛 1982.10 期

魏晋六朝隐逸思想对文学的影响,高光复,北方论丛 1982.10

谢灵运的世界观,钟优民,文学评论丛刊 16,1982.10

试论王粲的诗赋创作,吴云等,天津社会科学 1982.6 期

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曹道衡,《文史》16,1982.11

关于鲍照的《拟行路难》,孔令新,古典文学论丛 3,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12

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 1983

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 1983

刘勰论建安文学,牟世金,柳泉 1983.1 期

应该正确评价曹植的游仙诗,陈飞之,文学评论 1983.1 期

《与朱元思书》中几个注释的商榷,刘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3.1 期

谢灵运与南本《大般涅槃经》，孙述圻，南京大学学报1983.1期

鲍照诗文系年考证，丁福林，中华文史论丛1983.1期

略论谢灵运对山水诗的贡献，张明非，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3.1期

关于世说新语二三问题，饶宗颐，唐君毅先生纪念论文集——唐君毅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1983.2

徐陵为“律诗”首创人说，顾学颉，艺文志1，1983.2

旧校本《世说新语》跋，蒋天枢，学林漫录7，1983.3

《敕勒歌》小辨，王达津，光明日报1983.4.12文学遗产582

日本学者研究六朝文学的新收获，孙昌武，学林漫录8，1983.4

沈约声律论发微，姚振黎，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刊1，1983.6

试论鲍照诗歌的“俊逸”特色，丁福林，文学遗产1983.3期

何逊三题，曹道衡，中华文史论丛1983.4

庾信入北仕历及其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鲁同群，文史19，1983.8

试论鲍照的籍贯，丁福林，文史20，1983.9

徐陵《玉台新咏序》中“葡萄”一典试释，方北辰，文史20，1983.9

谢朓诗歌系年，陈庆元，文史21，1983.10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补记,胡国瑞,社会科学战线1983.3期

谢灵运之评价与梁代诗风演变,骆玉明、贺圣遂,复旦学报1983.6期

吴均和他的山水小品,周家驹,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3.6期

谢朓诗目辨,宋绪连,学术研究1983.6

从《文选》选录史书的赞论序述谈起——谈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特色,王运熙,光明日报1983.11.1

诠释《洛阳伽蓝记》志余,王伊同,清华学报15:12,1983.12

《木兰诗》的著录及时代问题续证,齐天举,文学遗产1984.1期

中州名家殷芸的《小说》,周楞伽,中州学刊1984.1期

萧统的文学主张和对文献编纂学的贡献,徐绍敏,杭州大学学报1984.1期

五凉时期的甘肃文学,颜廷亮,红柳1984.1期

《水经注》和《法显传》——纪念顾颉刚先生,章巽,中华文史论丛1984.3辑

《文选》的选录标准,沈玉成,文学遗产1984.2期

谢朓及其诗,郝立诚,中州学刊1984.2期

前后凉文学述略,赵以武,红柳1984.5期

从文论看南朝人心目中的文学正宗,文学遗产1984.4期

魏晋玄学和山水文学，钟元凯，学术月刊 1984.3 期

从推崇曹植看钟嵘的文艺思想，沈悦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84.3 期

论宫体诗，商伟，北大学报 1984.4 期

“吴均体”简论，赵家莹，杭州大学学报 1984.4 期

钟嵘的身世与《诗品》的品第，梅运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1984.4 期

从《世说新语》看名僧和名士相交游，孔繁，世界宗教研究 1984.4

爱国主义者郦道元与爱国主义著作《水经注》，陈桥驿，郑州大学学报 1984.4 期

北朝民歌的社会风俗史研究，李德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4.5 期

述评王夫之论谢灵运，宋绪连，辽宁大学学报 1984.5 期

《世说新语笺疏》的特色，曹道衡，读书 1984.12

江淹的拟古诗及其他，曹道衡，中国古典文学论丛 1984.12

论永明声律说的几个问题，黄炳辉，学术月刊 1984.12

谢朓诗歌艺术间论，张宗原，文学评论 1984.6 期

魏晋文学批评对情感的重视和魏晋人的情感观，杨明，复旦学报 1985.1

再论北朝诗赋，曹道衡，社会科学战线 1985.1 期

近年学者对《颜氏家训》的研究，孔繁举，书和人 512，1985.2

山水方滋,庄老未退——从玄言诗的兴衰看玄风与山水诗的关系,葛晓音,学术月刊 1985.2 期

玄晖独步南齐与太白低首宣城——论谢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陈庆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1985.2 期

宋刊文选李善单注史考,张月云,故宫学术季刊 2:4,1985

山水诗人谢灵运,徐公持,文史知识 1985.4 期

论齐梁文人革新晋宋诗风的功绩,葛晓音,北大学报 1985.3

谈皇甫谧的《列女传》,魏明安,学林漫录第 11 集,1985.8

嵇康生卒年新考,李剑国,南开学报 1985.3 期

郭璞简论,高国藩,齐鲁学刊,1985.3 期

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论四声说与悉昙之关系兼谈王斌、刘善经、沈约有关诸问题,饶宗颐,中华文史论丛 1985.3 辑

浅谈郭璞和他的游仙诗,欧阳忠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85.4 期

何逊生卒年问题试探,曹道衡,文史第 24 辑,1985.4

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曹道衡,艺文志第 3 辑,1985.8

何逊"居洛"和作法曹事辩,叶晨晖,南京师大学报 1985.4 期

《世说新语笺疏》标点商榷,方北辰,四川大学学报 1985.4 期

鲍照传记中的几个问题,唐海涛,幼狮学志 18:4,1985.10;大陆杂志 1985.11

论颜延之的文学创作,周健忠,山东师大学报 1985.5 期

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林文月,台大中文学报创刊号 1985.11

《昭明文选》与唐代文学,朱金城、朱易安,文学评论 1985.6 期

阴铿生平事迹考述,戴伟华,扬州师院学报 1986.3 期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章培恒,复旦大学学报 1987.1 期

谢灵运山水诗中的忧和游,王国璎,汉学研究 5:1(9期),1987.6

沈约隐逸思想探原,姚振黎,中央大学人文学报 5,1987.6

鲍照模拟诗的成就,唐海涛,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 20:2,1987.12

江淹《别赋》试析,何沛雄,香港大学中文系集刊 2,1987

究竟应该怎样评价魏晋南北朝文学——与章培恒同志商榷,刘世南,复旦大学学报 1988.1 期

再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兼答刘世南君,章培恒,复旦大学学报 1988.2 期

佛教与谢灵运及其诗,齐文榜,文学遗产 1988.2 期

谢灵运及其诗,王次澄,东吴文史学报 1988

由宗炳论山水画之“畅神”谈司空图诗品的评鉴特色,郑

毓瑜,中外文学 1988.5

太平经与七言诗的雏形,伍伟民,上海道教 1989.3-4 期

刘义庆世说杂纯文学分文观,詹秀惠,孔孟月刊 1988.6

洛阳伽蓝记零笺,叶国良,台大中文学报 3,1988.11

昭明文选祖饯诗中的离情,王国璎,汉学研究 7:1,1989.6

梁武帝"皇帝菩萨"的理念及政策之形成基础,颜尚文,历史学报(师大)1989.6

论魏晋名士的雅量——世说新语杂论之一,廖蔚卿,台大中文学报 2,1988.11

世说新语名士言谈中的用典技巧,梅家玲,台大中文学报 2,1988.11

中国地理学史上的丰碑:《水经注疏》撰写史及其历史价值,王国忠,中国文化月刊 113,1989.3

从文心雕龙批评的观点看谢灵运两首诗,李渝福,国文天地 5:4(52 期),1989.9

谢灵运《辨宗论》和山水诗,钱志熙,北京大学学报 1989.5 期

论江淹诗歌的几个问题,曹道衡,文学遗产增刊 14

1990—1999

论东晋南朝县令俸禄的标准——〈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质疑,杨联陞,杨联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论南朝文学的北传，唐长孺，武汉大学学报 1993.5 期

神女之探寻，〔英〕大卫·霍克斯，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陶潜诗歌中的典故，〔美〕詹姆斯·海陶玮，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真诰诗文押韵中所见的吴语现象，赤松佑子，吴语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1995

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许云和，文学评论 1996.5 期

永明运动的表里，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9

驳郭茂倩——论若干汉诗和魏诗的两种文本，桀溺，《法国汉学》第 4 辑 1999

曹植与神仙，侯思孟，《法国汉学》第 4 辑 1999

东晋南北朝佛教天堂地狱观念的传播与影响，侯旭东，佛学研究 1999.8 期

2000—

陆机研究综述，姜剑云，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 19，2001

《文心雕龙》"士衡多楚"释，唐长孺，《唐长孺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二、著　　作

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

陶渊明传,梁启超,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上),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192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0专集74,中华书局影印本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北京大学新潮社1923、1924年;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

汉魏乐府风笺,黄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北京大学出版组1924年印本校正,2008年

文选类诂,丁福保,上海医学书局1925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诗品注,陈延杰,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

曹子建诗研究,陈一百,上海,商务国学小丛书,1928年6月初版

曹子建年谱,古直,层冰草堂丛书,民国排印本

乐府古辞考,陆侃如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

陶靖节年谱,古直,隅楼丛书之二,1926年.

中国文学批评史,陈钟凡,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

汉魏六朝文,臧励龢,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汉魏六朝文学,陈钟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

建安文学概论,沈达材,民国丛书第四编影印北京朴社

1932 年初版

中国诗史,陆侃如、冯沅君,上海,大江书铺 1933 年;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6 年

曹植与洛神赋传说,沈达材,上海,华通书局 1933 年

道教史上册,许地山,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年;民国丛书影印本

魏晋诗歌概论,郭伯恭,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文心雕龙注十卷,范文澜,附校记一卷,上海开明书店 1936 年

佛学研究十八篇,梁启超,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

中国道教史,傅勤家,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文选学,骆鸿凯,上海,中华书局 1937 年初版;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增订再版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刘大杰,上海,中华书局 1941、1943 年;上、中、下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中国文学概说,〔日〕青木正儿,隋树森译,上海,开明书店 1938 年初版;重庆出版社 1982 年新版

魏晋思想论,刘大杰,上海,中华书局 193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罗常培,重庆,独立出版社 1945 年

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罗根泽,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7 年

魏晋清谈思想初论,贺昌群,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7 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校排

中古文学风貌、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思想,王瑶,上海,棠棣出版社 1951 年

汉魏六朝诗论丛,余冠英,上海,棠棣出版社 1952 年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长孺,北京,三联书店 1955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中古文学论集,王瑶,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重排本

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

陶渊明评论,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1956 年

评注昭明文选十五卷,于光华集评,台北,万国图书公司影印 1956 年

乐府诗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7 年

陶渊明批评,萧望卿,北京,开明书店 1957 年

范缜的无神论思想,陈元晖,武汉,湖北出版社 1957 年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郭绍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北京,三联书店 1959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张溥题,殷孟伦辑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

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罗常培、周祖谟,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1 年

汉魏六朝诗论丛，余冠英，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顾恺之研究资料，俞剑华、罗尗子、温肇桐编著，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江淹年谱，吴丕绩，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

竹林七贤之研究，何启民，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

汉魏思想与谈风，何启民，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67年

文心雕龙通识，张严，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

两晋史部遗籍考，廖吉郎，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0年

葛洪之文论及其生平，陈飞龙，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0年

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黄锦鋐，台北，淡江大学中研室1970年；学海出版社1979年

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潘重规，香港，新亚研究所印行1970年

曹子建研究,陈一百,香港,大地出版社 1971 年

文心雕龙文术论,张严,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3 年

昭明文选考略,林聪明,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4 年

文心雕龙缀补,王叔岷,台北,艺文印书馆 1975 年

文心雕龙研究,王更生,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6 年

文心雕龙批评论发微,沈谦,联经出版社 1977 年

文选黄氏学,黄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7 年

文心雕龙与佛道二教义理论集,石磊,香港,云在书屋 1977 年

文选李善注引尚书考,叶程义,台北,正中书局 1977 年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张仁青,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7 年

刘勰和文心雕龙,陆侃如、牟世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六朝文论,廖蔚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78 年

管锥编,钱锺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

文心雕龙创作论,王元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左思生平及其诗之析论,叶日光,台北,文津出版社 1979 年

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文心雕龙范注驳正,王更生,台北,华正书局 1979 年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胡国瑞,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同社 2004 年新版

刘勰与文心雕龙,詹锳,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

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陈寅恪文集之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魏晋风气与六朝文学,朱义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0 年

六朝唯美文学,张仁青,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0 年

昭明文选论文集,陈新雄、于大成编,台湾,木铎出版社 1980 年

美的历程,李泽厚,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美学散步,宗白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王运熙,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增补本

古典文学的奥秘——文心雕龙,王梦鸥,台北,时报出版社 1981 年

文心雕龙与诗品之诗论比较,冯吉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1 年

梁昭明太子萧统年谱,周贞亮,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净土上的烽烟——洛阳伽蓝记,王文进编撰,台北,时报出版社 1981 年

陆侃如、牟世金《刘勰论创作》(修订本),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文心雕龙的风格学,詹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

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杨明照,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钟嵘和诗品,梅运生,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鲍明远先生年谱,吴丕绩,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谢灵运,林文月,台北,国家出版社 1982 年

文心雕龙研究,龚菱,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2 年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王元化选编,济南,齐鲁书社 1983 年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郭绍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魏晋南北朝文论选析,杜保宪,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3 年

文心雕龙学刊(1-4),齐鲁书社编,济南,齐鲁书社 1983、1984、1986 年

六朝志怪小说考论,王国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3 年

鲍照生平及其诗文研究,余学芳,台北市,惊声文物供应公司 1983 年

《文心雕龙》创作论,王元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逯钦立遗著、吴云整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萧涤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

十四朝文学要略,刘永济,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中华书局 2007 年

曹植新探,钟优民,合肥,黄山书社 1984 年

乐府散论，王汝弼，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唐前志怪小说史，李剑国，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5 年增订本

建安文学研究论文集，《艺谈》编辑部编，合肥，黄山书社 1984 年

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王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文心雕龙绎旨，姜书阁述，济南，齐鲁书社 1984 年

文心雕龙论文集，〔日〕兴膳宏，彭恩华译，济南，齐鲁书社 1984 年

古典文学论探索，王梦鸥，台北，正中书局 1984 年

南朝诗研究，王次澄，台北，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 年

由隐逸到宫体，洪顺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4 年

文心雕龙研究（修订本），王更生，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4 年

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分类索引，金荣华，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1984 年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

谢灵运论稿，钟优民，济南，齐鲁书社 1985 年

乐府诗史，杨生枝，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建安文学编年史，刘知渐，重庆出版社 1985 年

文选评点，黄侃评点、黄焯编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

中古文学系年,陆侃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牟世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

才性与玄理,牟宗三,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

六朝诗论,洪顺隆,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再版

六朝文论,廖蔚卿,台北,联经出版社1985年

建安文学论稿,张可礼,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

阮籍与嵇康,徐公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鲍照和庾信,刘文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曹道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文心雕龙》探索,王运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同社2005年增订本

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何兹全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汉魏六朝赋家论略,何沛雄,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

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李丰楙,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

昭明文选研究初稿,林聪明,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论中国诗,(日)小川环树,谭汝谦、陈志诚、梁国豪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同社2003年增补本

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陆侃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魏晋玄学和文学，孔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正始玄学，王葆玹，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

中国美学史，李泽厚、刘纲纪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文心雕龙》新探，张少康，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

赋史，马积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中国古代文论管窥，王运熙，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增补本

文史探微，周勋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水经注研究二集，陈桥驿，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水经注碑录，施蛰存，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

文心雕龙与佛教关系之考辨，方元珍，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历代诗文要集详解(古诗文要籍叙录)，金开诚、葛兆光，北京出版社1988年；中华书局2005年新版

刘勰年谱汇考，牟世金，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

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甫之、涂光社编，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

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屈守元,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赵福海等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

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江蓝生,北京,语文出版社 1988 年

中国中古诗歌史,王钟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魏晋三大思潮论稿,田文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汉魏六朝四十家赋述论,高光复,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 1988 年

文心雕龙综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编,台北,学生书局 1988 年

魏晋神仙道教,胡孚琛,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八代诗史,葛晓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中华书局 2007 年修订本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王运熙、杨明,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文选学,骆鸿凯,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山水诗人谢灵运,李森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9 年

中古文学论丛,林文月,台北大安出版社 1989 年

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黄水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9 年

南朝颜谢诗研究，陈美足，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9 年

沈约及其学术探究，姚振黎，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9 年

汉魏六朝佛道两教之天堂地狱说，萧登福，台北，学生书局 1989 年

汉魏六朝诗论（上下），梁简能，香港，金多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9 年

文心雕龙论集，陈耀南，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 1989 年

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日〕小尾郊一，邵毅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六朝文学论文集，〔日〕清水凯夫著，韩基国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

汉唐文学的嬗变，葛晓音，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佛典·志怪·物语，王晓平，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

陶渊明探稿，魏正申，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0 年

钟嵘诗歌美学，罗立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0 年

挚虞研究，邓国光，香港，学衡出版社 1990 年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罗宗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5 年新版

六朝骈文声律探微，廖志强，台北，天工书局 1991 年

中古学术论略,张蓓蓓,台北,大安出版社 1991 年

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方北辰,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1 年

南朝诗魂,杨明,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汉乐府研究,张永鑫,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魏晋南北朝赋史,程章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同社 2001 年新版

东晋文艺系年,张可礼,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道教文学史,詹石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

《文心雕龙》研究,(日)户田浩晓,曹旭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赵超,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同社 2008 年新版

南北朝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

钟嵘《诗品》研究,张伯伟,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钱志熙,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日〕小南一郎著,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同社 2006 年修订本

《文赋》研究新论,刘忠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文选》导读,屈守元,成都,巴蜀书社 1993 年

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蒋述卓,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齐梁诗歌研究,阎采平,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卢盛江，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阮籍评传，高晨阳，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郦道元评传，陈桥驿，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曹道衡，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4 年

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傅刚，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清水凯夫《诗品》《文选》论文集，(日)清水凯夫，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曹道衡、沈玉成，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王运熙、杨明，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罗宗强，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

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刘跃进，北京，三联书店 1996 年

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张松辉，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六朝美学史，吴功正，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6 年

傅玄评传，魏明安、赵以武，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集，李丰楙，台北，学生书局 1996 年

误入与谪仙——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李丰楙，台北，学生书局 1996 年

昭明文选学术论考，游志诚，台北，学生书局 1996 年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穆克宏著,中华书局 1997 年

陶渊明研究,袁行霈,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傅玄及其诗文研究,王绘絜,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7 年

北朝文学史,周建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

中古文学文献学,刘跃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钟涛,东方出版社 1997 年

齐梁文坛与四萧研究,胡德怀,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佛教语言阐释——中古佛经词汇研究,颜洽茂,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钱志熙,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7 年

南北朝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

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丁福林,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曹道衡,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诗品研究,曹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昭明文选研究,穆克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

中外学者文选学论文集,俞绍初、许逸民主编,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

中外学者文选学论著索引,俞绍初、许逸民主编,北京,

中华书局1998年

隐逸避世的名士集团:竹林七贤述评,鲁金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陶弘景与道教文学,香港聚贤馆文化有限公司1998年

抒情与叙事,洪顺隆,台北,黎明1998年

六朝辞赋史,王琳,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世说新语研究,范子烨,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丁福林,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阴铿与近体诗,赵以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汉魏六朝诗讲录,叶嘉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中古五言诗研究,吴小平,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陶潜评传,李锦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中国中古社会史论,毛汉光,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上海书店2002年

魏晋文学史,徐公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周勋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沈约研究,林家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罗国威,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六朝作家年谱辑要,刘跃进、范子烨编,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六朝美学,袁济喜,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曹道衡、刘跃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

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李文初,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文选》诗研究,胡大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昭明文选》研究,傅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文选版本研究,傅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玉台新咏研究,刘跃进,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

中古时期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王利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

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逯耀东,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2000 年;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

从平城到洛阳,逯耀东,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2000 年;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

中古感伤文学原论,徐国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史论考,王启涛,成都,巴蜀书社

2001 年

文心雕龙研究史，张少康、汪春泓、陈允锋、陶礼天，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张可礼，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王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吴云主编，北京出版社 2001 年

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胡阿祥，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萧统评传，曹道衡、傅刚，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六朝道教史研究，〔日〕小林正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乐师与史官，阎步克，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

魏晋学术人物新研，张蓓蓓，台北，大安出版社 2001 年

佛教与中古小说，陈洪，台北，佛光山文教基金会 2001 年

郭璞研究，连镇标，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

慧远评传，曹虹，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南朝佛教与文学，普慧，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

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卢盛江，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通论，张庆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文选之研究,〔日〕冈村繁,冈村繁全集第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日〕冈村繁,冈村繁全集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陶渊明李白新论,〔日〕冈村繁,冈村繁全集第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拓跋史探,田余庆,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

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葛兆光,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

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曹道衡、沈玉成,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

中古文史丛稿,曹道衡,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六朝诗歌中之佛教风貌研究,王延蕙,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魏晋玄言诗研究,张廷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 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年

太康文学研究,姜剑云,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

现代《文选》学史,王立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胡宝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李士彪,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鲍照年谱,丁福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中古诗人群体及其诗风演化,阮忠,武汉出版社 2004 年

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田余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六朝隋唐医学之传承与整合,范家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两晋诗风,王澧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谢灵运研究,李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六朝文体批评研究,贾奋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刘跃进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罗新、叶炜,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嵇康评传,童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赵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王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汉魏六朝道教文学思想研究,蒋振华,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唐长孺文存,朱雷、唐刚卯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二十世纪以来先秦至唐代诗歌研究,刘怀荣等,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

两晋士风与诗歌——以"二十四友"研究为中心,张爱波,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

魏晋南北朝美育思想,钟仕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词汇研究,周俊勋,成都,巴蜀书社 2006 年

鲍照诗文研究,苏瑞隆,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

叶迦莹说汉魏六朝诗,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

四萧研究——以文学为中心,林大志,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

江淹年谱,丁福林,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7 年

魏晋南北朝的感物美学,李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聂石樵,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

宫体诗研究,胡大雷,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魏晋南北朝图书业与文学,陈传万,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陈秀兰,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



三、文　集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校编，1916年铅印本

汉魏晋宋五言诗选集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

乐府诗选，余冠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汉魏六朝小说选，徐震堮选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汉魏六朝散文选，陈中凡，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中华书局1962年

三曹诗选，余冠英选注，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谢灵运诗选，叶笑雪选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鲍参军诗注，叶菊生校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庾信诗赋选，谭正璧、纪馥华选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洛阳伽蓝记校注，范祥雍校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

文心雕龙校注，(清)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刘子集证，王叔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专刊44，1961年

《诗品》注,陈延杰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

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文心雕龙校释,刘永济校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2 年

魏晋南北朝赋选,瞿蜕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4 年

两晋南北朝文汇,高明编,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66 年

谢宣城集校注,洪顺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研所硕士论文 1966;中华书局 1969

谢宣城诗注,李直方注,香港,万有图书公司 1968 年

世说新语校笺,杨勇,香港,大众书局 1969 年,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修订本

谢宣城诗注,郝立权注,台北,艺文印书馆 1971 年

文镜秘府论,周维德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年

陶渊明诗笺证稿,王叔岷,台北,艺文印书馆 1975 年;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

世说新语补正,王叔岷,台北,艺文印书馆 1976 年

文心雕龙缀补,王叔岷,台北,艺文印书馆 1975 年

颜氏家训斠注,王叔岷,台北,艺文印书馆 1975 年

阮籍集,李志均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国立编译馆编,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8 年

乐府诗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曹操集译注，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汉魏六朝赋选，瞿兑之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鲍参军集注，钱仲联增补集说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庾子山集注，(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诗品校注，杨祖聿，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

文心雕龙译注(上下册)，陆侃如、牟世金，济南，齐鲁书社1981、1982年

陆机集，金涛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宋书乐志校注，苏青仁、萧炼子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

齐民要术校释，缪启愉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年，同社1998年第二版

文心雕龙斠诠，李曰刚，台北，国立编译馆1982年

抱朴子内篇校释，王明，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

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文镜秘府论校注,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钟嵘《诗品》讲疏、人间词话讲疏附补遗,许文雨讲疏,成都古籍书店,1983 年

诗品汇注,李徽教,韩国岭南大学出版部 1983 年

王粲集注,吴云、唐绍忠注,郑州,中州出版社 1984 年

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

江文通集汇注,(明)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中华书局 1984 年

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著,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

殷芸小说,周楞伽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玉台新咏笺注,(清)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

刘子集校,林其锬、陈凤金集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陆机《文赋》校释,杨牧,台北,洪範书店 1985 年

《文赋》、《诗品》注释,周伟民、萧华荣注,郑州,中州古籍

出版社 1985 年

《文选》李注义疏，高步瀛著，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

抱朴子内篇校释，王明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

水经注校，王国维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曹操集注，夏传才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钟嵘诗品校释，吕德申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魏晋南北朝诗话，萧华荣编，济南，齐鲁书社 1986

嵇康集注，殷翔、郭全芝注，合肥，黄山书社 1986 年

阮籍集校注，陈伯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

谢灵运集校注，顾绍柏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傅玄、阴铿诗注，蹇长春、王会绍、余贤杰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人物志及注校证，郭模，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7 年

陆云集，黄葵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

何逊集注、阴铿集注，刘畅、刘国君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刘子校注，杨明照校注，成都，巴蜀书社 1988 年

刘孝标集校注，罗国威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3 年修订本

荆楚岁时记译注，王毓荣，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8 年

荆楚岁时记校注，谭麟，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建安七子集，俞绍初辑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2006

年新1版

阴铿诗校注,张帆、宋书麟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

何逊集校注,李伯齐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

水经注疏,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谢宣城集校注,曹融南校注集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王褒集校注,牛贵琥校注,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

颜氏家训集解,王利器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江淹集校注,俞绍初、张亚新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诗品集注,曹旭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孙昌武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钟嵘诗品笺证稿,王叔岷,台北,中研院文哲所中国文哲专刊1,1994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列仙传校笺,王叔岷,台北,中研院文哲所中国文哲专刊7,1995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沈约集校笺,陈庆元校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

文心雕龙译注,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

陶渊明集校笺,龚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魏晋南北朝文论选，郁沅、张明高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

异苑、谈薮，范宁校点，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

抱朴子外篇校笺，杨明照撰，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

钟嵘诗品评注，张怀瑾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文赋、诗品译注，杨明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

敦煌本《文选注》笺证，罗国威笺证，成都，巴蜀书社 2000 年

昭明太子集校注，俞绍初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三国两晋十六国诗文纪事，周建江辑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冤魂志校注，罗国威校注，成都，巴蜀书社 2001 年

文赋集释，张少康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

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董志翘译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撰，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

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穆克宏、郭丹，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汉魏六朝诗选，邬国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吴均集校注，林家骊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潘岳集校注(修订版),董志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洛阳伽蓝记校笺,杨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卢盛江校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南北朝诗话校释,钟仕伦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文心雕龙校释附征引文录,刘永济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徐陵集校笺,许逸民校笺,中华书局2008年

汉魏六朝诗六种(汉魏乐府风笺、魏武帝魏文帝诗注、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谢康乐诗注、鲍参军诗注),黄节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后　记

2008年秋天起，我在复旦大学用了一个学期，给中文系的研究生开一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专题的课。这门课的讲义，经过随后几个月匆匆忙忙的修订，就变成了这本小册子。

上课的宗旨，在当时，就是要跟大部分为一年级硕士的同学一起，进入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研究之门。入门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不止于一，不过我最终选择的，是阅读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经典的方式。通过阅读近代以来的这些重要的学术著作，我想，或许可以帮助同学比较快地接触到这个领域的研究状况、它的历史以及与这种历史形成有关的思想文化背景、它曾经关注过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用的方法，等等。而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开始我们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新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首先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未来的研究，其实都还只是近代以来的学术史的延续。是近代以来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这一学科，奠定了现有的基础，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经常性的学习和观摩，不但是我

们认识前辈、认识学术发展历史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筹划我们自己的研究路向的必要步骤。

第二，从学术史的变迁过程当中，也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一个学科在研究上的推进，尽管要凭着很多人的、很大量的研究成果的积累，但是关键的一步，却往往靠的是个别人或个别著作的“点睛”功夫，这样的研究者或研究著作，我们会视之为典范。在入门之初，研读典范之作，一方面当然是希望自己可以借此取境变得高一点，另一方面，也是要由此了解打通关节，那所谓关键的步骤，究竟在哪里。

第三，所谓典范的产生，当然取决于研究的眼光和方法，只是这学术的方法和眼光，是需要在时代风气里得到提练和磨勘的。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光有对本专业的热情还很不够，还要有对时代的关怀和心胸。

上过这门课的同学，大概都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是怎样地从刘师培、鲁迅、陈寅恪他们的专业论著中，读到深刻在纸背后面的，那种对于大时代的热切的关怀与深厚的责任感，他们使我们知道，即使是一门研究古典的学问，也并不能躲在冰冷的象牙塔里面完成。

课程结束，讲稿变成了现在的手册。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入门书，作为这套丛书的一部分，我想需要补充交代的，还有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本稿是在原课堂讲义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所以，没能严格按照这套丛书原来规定的体例去做，主要是缺少单独的有关“方法”和“视野”的章节。不过，细心的读者当能发现，这两部分的内容，其实已经涵括在对于整个研究史的叙述以及为基本阅读书目撰写的提要当中，因为对研究史的回顾，在这里，基本上还是以研究个案为中心的，而个案

的选择，当然已经考虑到了它们的代表性，它们是本领域的经典之作，而它们本身就显示了何谓“方法”、何谓“视野”。

其次，我很遗憾的是这一次，没能将海外的包括港台地区的相关研究史纳入其中。本来在一本入门书里，这是不应该缺损的内容，尤其是在学界日益开放、学术日益国际化的今天。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本身即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学科，在港台、海外特别是日本，都有过极其精彩的研究历史和极为丰富的成果，光是港台和日本，也许就应该各写出像现在这样的一册书来，我担心，蜻蜓点水般地在这儿列几个书名或几个学者的名字，反而会误导同学对它们的认知，所以这一部分，这一次，只能忍痛割爱。

当然，考虑到本书的读者，应以一般大专院校的硕士一年级学生为主，这个阶段的学生，也许绝大多数都没有机会看到很多海外出版的专业论著，但这些专业性论著，有的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因此为了补救，我也采取了一个比较实用的办法，就是现在这样的，从中选出有大陆中文译本的若干。

再次，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论著，过去台湾的洪顺隆和王国良教授都做过相当规模细致的调查，洪顺隆教授主编有《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增订版，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编印，1992 年)，王国良教授也编有《魏晋南北朝文学论著集目》(正编、续编，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1997 年)，收录都很完备。此外，台湾的邝利安教授所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论文书目引得》(台湾中华书局，1971 年)，也收有文学史的部分论著目录。我这次编写的并不理想的参考论著，主要依照的就是这三种目录，由于时间仓促，条件有限，大部分也都没有经过重新核查，因此一方面，我要对前辈学者所做功德无量的这种文献调查工作，表示最高的敬意，另一方面，

如果转写时发生错误，那责任也都在我，这是我要预先向读者道歉的。

应该感谢选修了我这门课的二十名同学，因为有他们的参与讨论，他们年轻、大胆的见解，不断地刺激着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他们认真、热情的态度，也让我在这一学期的课程里面，始终保持着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而不敢有一丝丝懈怠。

讲义的初稿完成以后，部分章节，也曾通过电子邮件和挂在网上的方式，向一些同行的友人请益，胡宝国、陆扬和陈怀宇先生都在百忙之中，给了我非常宝贵的意见，其中的一部分建议，已被我纳入书中。在这里，因此也要向他们表达最诚恳的谢意。

二十多年前，我开始接触到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能够始终如一地坚守在这个领域，却是因为做了教师，现在，才被强逼着不得不安定下来。在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想，我都将跟同学们一道，在这个学科领域中，作认真的、仔细的探究。事实上，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初入门者，以初入门者的身份，给复旦的学生上这样的入门课，现在，还要将这门课的讲义出版，写给更多的学生，在我，内心里一直是十分踊跃，却又十分惶恐的。在这本书的最后，因此，除了要向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宋文涛先生和代表出版社审理过书稿的我的同事张金耀先生致谢，特别感谢他们为参考论著部分做的一些校订工作，我也要请我的读者们不吝赐教，使我将来仍有修订校正的机会。

戴燕

2009 年 5 月 4 日于复旦光华楼